

1930 年

第

卷

第

6

期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編

1928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
第六期

目 錄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一九三〇年全中國五一運動的總結

蘇聯集體農業運動近況

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代

四川革命形勢的開展及其發展的前途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出版——定價大洋一角

問友

曉野

楊新松

之華

兌陽

反對托洛斯基對列甯主義的進攻

問友

——駁斥托洛斯基之早已破產的所謂「不斷革命論」——

一 引言

托洛斯基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君士坦丁堡發表了一篇「什麼是「不斷革命論」？」的大綱，這個大綱登載於中國托洛斯基主義的機關報「我們的話」第十七期上，直到今年五月我們纔看見。

在這個大綱中，托洛斯基將他之早已破產的理論，重新從那些舊書堆中找出來，外面加了許多新的欺騙人的保護色。我們在他這個大綱中，絕對找不出任何新的理論，都是些在二十年以前已被列寧親身所排斥與辱罵了的舊東西，都是在整個歷史發展的事實前面所已經宣佈破產了的理論。

但我們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需加以深刻的注意，並必需站在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給以迅速的正確的回答。因為：

第一，這個文件是整個托洛斯基主義的基本路線，代表着托洛斯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之各方面的理論系統。我們以前批評托洛斯基主義都是只說到其中的某一問題

，往往不能指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內容。只有在托洛斯基這一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批評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內容，可以將托洛斯基之整個的背叛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地方，都有系統的一貫的揭露出來。

第二，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乃是顯然的對列寧主義的直接進攻。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們用了由列寧著作中選擇出來的許多重要引證，處處都證明列寧主義是與托洛斯基之所謂「不斷革命論」完全不同的。托洛斯基表面上還拿着「列寧」的旗幟，表面上是進攻現在的共產國際，實質上所發表的一切理論，都與列寧主義的原則絕對矛盾，並且實質上是列寧在未死以前所已經親身擊破的理論。但托洛斯基現在却披一件「列寧」的外衣，事實上要以托洛斯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一進攻列寧主義的策略，比一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社會法西斯蒂的手段都更陰險。爲擁護列寧主義起見，對於托洛斯基主義這一進攻，必須立刻給以列寧主義的回答。

第三，在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中，說了許多關於民主革命，工農民主專政，革命轉變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與現在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有密切的聯繫。托洛斯基固然在這個上頭寫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但我們正必須要明瞭這一切錯誤觀念的實質，必須由駁斥托洛斯基這一錯誤理論中得出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瞭解。只有在打倒了這些錯誤理論之後，纔能更深刻的認識正確的路線。

根據以上這三個理由，我們總覺得對於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文件，必須給一有系統的嚴重的駁斥。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才希望每一個列寧主義的戰士，都來嚴重的仔細的研究這一問題。

在這一大概中，托洛斯基的原文寫得非常簡單，使許多顯然的不通的理論，我們還不能知道他自己將要怎樣解釋。因此，使我們的許多批評，也只能很原則的指出。托洛斯基在這個大概的後面說，這個大概是他準備出一本「大書」的內容，或者這些不通的理論，托洛斯基將要在「大書」中去發揮罷！但現在，一則因為托洛斯基在這一文件上寫得文字非常簡單，二者則因為他的錯誤太多，問題太多，所以使我們寫的回答終不能發揮而只限於很原則的。

為使問題明瞭起見，為使讀者可以看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全部的真實的內容起見，我們的回答將要完全依靠托洛斯基所提出的問題的系統，並在每一段之前，將托洛斯基所寫的原文都一字不改與一字不刪的寫出來。我們在托洛斯基之每一段話的後面，寫出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駁斥。托洛斯基的原文共計十四條，現在我們應當分段的研究：

二 不斷革命論與列寧及托洛斯基

第一：「不斷革命論現已需要每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來加以莫大的注意了。因為理

論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過，已把這問題從我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又使這問題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和世界革命方法的問題了。

這幾句話本來只是一個序言，沒有什麼內容，我們並不說「不斷革命論」不需要注意，若能研究與注意，自然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好的。但這裡我們必要簡單的指明幾點：

一、馬克斯指出無產階級應當使革命不斷的前進，直到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這自然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原則。列寧應用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的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任務，是要使這個革命走到澈底勝利，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革命轉變論也就是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繼續發展，現在我們認爲「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完成中轉變入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比較簡單的不斷革命論要更能指出革命發展之正確的階段與方向，更能表現無產階級在各個具體環境中之戰略的中心。俄國革命的經驗，是執行的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的原則，但同時列寧告訴我們一切策略中是用的革命轉變的名詞，這「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了解，是列寧在二十世紀對於馬克斯主義之繼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爲此，我們現在只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名詞，這其中不但已經包含了馬克斯之

不斷革命的原則，並且還包含列寧對馬克斯主義的繼續發展。托洛斯基現在想以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與列寧的革命轉變論相對立起來，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的名詞來掩飾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或是想以「不斷革命論」來代替革命轉變論，這些都會必然的走到可恥的破產。

二、由馬克斯的不斷革命論到列寧的革命轉變論，這是馬克斯主義在半世紀之「理論鬥爭和階級鬥爭之經過」中發展出來的。托洛斯基說不斷革命論是「從我國（自然說的俄國——友）馬克斯主義者之過去的紛歧（!）意見中分別了出來」，這句話我們完全不懂，因為這完全是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對歷史事實的隱蔽，與對羣衆的欺騙。托洛斯基抹殺了自己在俄國歷史上之不可饒恕的錯誤，抹殺了列寧親自反對托洛斯基主義「不斷革命論」的二十年的歷史。抹殺了自己（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曲解馬克斯之不斷革命論之原則以與列寧對抗的事實，抹殺了自己在一九〇五年，辱罵布爾塞維克是「自限」，是「反革命」的事實，抹殺了自己過去之一切爲列寧所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破產的理論。將這些在俄國革命與列寧主義之發展中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事實都完全不提，而以「過去之紛歧」這幾個字，將他不負責任的不作斷語的輕描淡寫過去。每一個馬克斯列寧主義者都應該公開的承認，在整個俄國馬克斯主義的歷史中，絕不是什麼「紛歧」，而是托洛斯基主義在列寧親身二十年的打擊之下，所得到的可恥

的破產。

三、說不斷革命論「成爲性質的，內在關係的」，我們不懂這一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只好「敬謝不敏」，「不知所云」、這或許只是翻譯上的問題罷！

三 托洛斯基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第二，「對於落後的資產階級發展的國家，尤其是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不斷革命論已顯示了這些國家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只有經過被壓迫的民族的尤其是農民羣衆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

我們在這一段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下面，同樣應當給以下列幾點的駁斥：

一、落後國家之民主及民族自由的任務，他的解決並不是一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纔有可能」，而是到無產階級專政，纔得着最後勝利的保證。這個話的意義就是說，在他還沒有得到最後勝利以前，還沒有到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革命運動還要經過其他的必要的階段，如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經過這一階段然後革命勝利「纔有可能」，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則民主革命已經得了最後的完成，那時候並不是「纔有可能」的問題了。

二、托洛斯基這段話，完全忽視革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的階段，在落後國家中便可以不用經過民主革命而直接從無產階級專政起，這與列寧主義是絕對矛盾的。列寧在

一九〇五年以前告訴我們：

「只有糊塗，他能明瞭現在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他能提出組織革命公社（即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友）的口號。只有糊塗與反動，他才輕視無產階級之參加與領導民主革命，他才懷疑無產階級之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只有糊塗，他才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條件混淆起來，因為在性質及參加的社會力量上都是不同的。」（「社會主義與農民」。見俄文列甫全集，第一卷 第四四八面）

三、托洛斯基這些話，完全將「落後國家」無產階級之特殊條件與任務一概抹殺。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俄國也是一個落後國家，我們看列寧是怎樣說的：

「俄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無產階級之覺悟與組織程度（與客觀條件緊相關連的主觀條件），使工人階級徹底解放一時成爲不可能的事。只有那般最唱高調的人，能把現時民主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置諸度外；只有那般最無聊最作樂夢的人能不顧到目前工人羣衆是如何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目的，及其實現的方法。但是我們相信，工人解放只有工人自身的事情纔有可能，若羣衆無覺悟與組織，無準備與訓練，無反對資產階級之公開的階級鬥爭的鍛鍊自己，則社會主義革命簡直無從說起。」（兩個策略，中文本，第一五面）

四、托洛斯基之「欲完成其民主的及民族自由的任務」，是「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這將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混淆起來，這完全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觀點。列甫當一九一八年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次基」的時候，他寫着：

「祇有布爾塞維克才嚴格的研究了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使前者幹到徹底之後，他們即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與唯一馬克斯主義的政策」。——（「革命與考次基」，中文本，第一四一面）

五、以上這些話，證明現在一九三〇年的托洛斯基主義與在十月革命前之反對列寧的托洛斯基主義，在基本理論上完全沒有改變，我們看，列寧對於托洛斯基的批評是：

「托洛斯基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友——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鬥爭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六面）。

四 托洛斯基將反資產階級看成民主革命的唯一任務，不談反對封建勢力

第三，「不僅土地問題及民族問題亦同樣決定了農民之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沒有工農的聯合，民主革命的任務即無解決的可能，且亦無需於嚴重的提出。但欲

實現這兩個階級的聯合，除了和民族自由資產階級作不妥協的鬥爭以外，其道末由了」。

對於這一段托洛斯基的理論，我們應當說明的是：

一、工農聯合既然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則首先（注意）應當「不妥協鬥爭」的還不是對民族自由資產階級，而是對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爲什麼托洛斯基在整個大綱中不提反對封建地主及反帝國主義呢？爲什麼當托洛斯基說到「落後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時候，當着說到解決「民主」「民族」任務的時候，偏只說反對資產階級而將封建地主及帝國主義不提呢？這正是托洛斯基之混淆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具體的表現。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定要說，現在是帝國主義時代，只有反資產階級的鬥爭，沒有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這些表面的「左傾」，早已被列寧打得粉碎呵！請看列寧怎樣寫的：

「托洛斯基的基本理論……：『我們生長在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並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和舊統治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這簡直是笑話：假使俄國帝國主義已經使俄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着，那麼，在俄國前面便直接擺着社會主義革命！！那麼，便應該反對「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那時候我們便不能說「革命的工人」，而應該說「在社會主義政府中的工人」

所以，在民主革命中，應當堅決的不妥協的和資產階級鬥爭，這是指在資產階級開始表現妥協以及叛變革命的時候，並不是沒有時間和空間之限制的。托洛斯基將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看成民主革命之一開始便必然有的任務，甚至於唯一的任務，將這個任務還超乎反對封建勢力之上，這便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起來，這是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路線。

五 托洛斯基混淆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不問兩（或者是每字之誤——友）個國家之在第一階段的革命是怎樣的革命，工農聯盟之實現，只有在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治領導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有經過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

這一條前半段也有錯誤，因為譬如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雖然還是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之下，但列寧仍然將他看成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不過這一錯誤，還不成嚴重的問題，因為正確的路線，在民主革命中是要爭取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的。但後半段的錯誤，他以為「以聯合農民為基礎」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他以為「工農革命聯盟之實現」，「只有經過無產階級

專政纔有可能」，這無論在理論上及實際上都是不通的，這個不通與整個托洛斯基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列寧），是有密切聯繫的。因為沒有看到革命的資產階級性，沒有看到由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革命中間的過渡時期，所以將「工農革命聯盟」，「以聯合農民為基礎」的政權，「解決民主革命任務」的政權，都沒有條件的看成無產階級專政，這簡直離開了馬克斯主義的初步原理。我們看列寧說到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時候，他將這個專政的性質說得非常顯明，列寧說：

「要打破這個（指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專制政府——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自然將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他至多不過能把土地私有權根本上重新分配一次，以滿足農民的利益，施行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政體為止。……這樣一個勝利，還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範圍的。……」（「兩個策略」，中文本，第六二——六四面）。所以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專政中間還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這個東西是托洛斯基永遠所不能瞭解的。

六 托洛斯基自己不懂列寧所指的工農相互關係，反罵列

寧沒有指明工農相互關係

第五，「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舊口號——「工農民主專政」正確的顯示了上述性質的工農及自由資產階級的相互關係。這一點已由十月革命的經驗來證明了。但列寧的公式並沒有期先解決革命聯盟中工農應發生若何相互關係的問題。換句話說，這公式只有一個代數學上的未知數，而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的已知數却都是由這代數學上的未知數來決定的。這歷史經驗過程中之數學上的已知數若不加以其他的解說，那只證明農民之在革命中的作用不論其若何偉大，無論如何是不能發生獨立的或領導作用的。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產階級走，這就是說「工農民主專政」只有當作領導農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專政看待，才有意義」。

在這一段話中，除了什麼「代數」，「數學」，「已知數」，「未知數」這些故意使人不懂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哲學」以外，我們可以看出托洛斯基的三點謬誤：

一、由「十月革命的經驗」證明的是托洛斯基之「上述」的理論都完全錯誤，十月革命不是馬上便成功的，乃是由二月革命以後，經過許多「革命發展的過渡階段」，最後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無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並不是俄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因爲第一階段乃是二月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並不是馬上建立的，而是經過一定的階段，經過工農民主專政政權的實現，這種民主專政並不是立刻便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發表的論策略書中，列寧說：

「在俄國革命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某種形式下，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公式所能預見的，祇是階級的相互關係，而不是實現這種相互關係和相互合作的具體的政治機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已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但這個政權——二月革命以後的蘇維埃政權，任何人都知道他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工農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了一些革命發展的過程，到十月革命以後才實現。而上面（第四條）托洛斯基的理論偏是說「工農革命聯盟，……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這種理論已經被十月革命的經驗打得粉碎。現在托洛斯基反說十月革命證實了托洛斯基主義，這真是絕無恥的修改歷史的事實。托洛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的口號是「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這正是托洛斯基主義將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混合一齊的實際運用。但這個口號歷次的被列寧打得粉碎。到二月革命以後，就在我上面所引證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所發表的論策略書上，列寧還寫着：

「我們會不會陷入主觀主義的危險，會不會有「跳越」尚未完成的（農民運動

尙未過去) 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而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那種危險呢？ 倘然我這樣說：「推翻沙皇，建立工人政府」，那麼，就有上述的危險。 我所說的不是這樣，而是別個樣子。」

列寧的策略是經過各種過渡的階段以走到無產階級專政，托洛斯基主義是由現在馬上跳到無產階級專政。 及到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到十月革命之後，於是托洛斯基先生跑出來說：「我的對了，我說的是要無產階級專政」。 這真是笑話！ 我們由這個中間，除了看見托洛斯基之最無恥而外，用十萬倍的顯微鏡也照不出別的東西。

二、托洛斯基說「列寧的公式並沒有期(大概是預字之誤——友)先解決革命聯盟中工農應發生若何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這簡直是托洛斯基的胡說與「自作聰敏」。 列寧的公式——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工農民主專政轉變於無產階級革命，這裏面有什麼「工農相互關係」沒有指出呢？ 「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否表示一種「工農相互關係」呢？ 無產階級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否一種「工農相互關係」呢？ 列寧是最明瞭「工農相互關係」的了，也只有列寧，他給了「工農相互關係」之最完全的最正確的各方面的指導，托洛斯基自己對於「工農相互關係」絲毫不懂，對於列寧的指示完全不相信，現在反而出來罵列寧，說「列寧的公式並沒有預

先解決革命聯盟中之工農相互關係」，這真是無恥已極！

一六

三、農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資產階級走！

做出一個結論：「工農民主專政，只有當着領導農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專政看待，才有意義。這又是將「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混淆起來，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這個錯誤我已經在上一節中引證列寧的話將他駁斥了。

七 托洛斯基否認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基礎

第六，「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區別是由工農民主專政的階級內容來決定的，工農民主專政之實現，只有待於代表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利益的獨立的革命政黨之有可能的形成——這政黨之有可能奪取其政權，仍有賴於無產階級的各種幫助及其對於革命政權的決定。但現代的歷史，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來俄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成立農民政黨有滿途的不可超越的障礙，這障礙就在小資產階級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依附性，及其深人的內在的變化，因這變化，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上層份子在最重事變中，尤其是在戰爭與革命中跟隨了大資產階級，其下層份子跟隨了無產階級，而中間分子則在兩大極端之間選擇他們的出路。在克倫斯基與布爾塞維克之間，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介於其間的。」

我們在這一段話中間應當指出的：

一、既然托洛斯基在這裡寫着「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之區別是由工農民主專政的階級內容來決定」，則工農民主專政便與無產階級專政便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東西。這與托洛斯基在上面幾段話中所寫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絕對的矛盾。

二、托洛斯基在這裏說：「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介於其間的」，這是不通的，譬如現在中國有好多的地方蘇維埃政權，這不是國民黨的政權，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這就是「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也許托洛斯基已經投降了帝國主義，那麼，他能說這不是革命政權而是「土匪」與「新式流寇」，但我們從列寧主義的原則上看來，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因為在這裏是依靠大多數農民羣衆的力量，徹底摧毀了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之政治與經濟的特權，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但還沒有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政綱，這就是工農民主專政。

三、托洛斯基說「在克倫斯基與布爾塞維克之間，不能也不會有工農民主專政」，這又是完全修改歷史事實與違背列寧的教訓。我在前一節中已經引證了列寧在「論策略書」上所寫的話：「在俄國革命中，工農民主專政已經實現了。……工人兵士代表蘇

維埃——這就是已經在生活中實現了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民主專政，正是在二月到十月之間，正是在臨時政府及布爾塞維克之間，正是托洛斯基所永遠「不能也不會」瞭解的問題。

四、在這裏，托洛斯基的中心問題是說工農民主專政「不能也不會」實現，他所持的「理由」便是小資產階級農民不能有「獨立的革命政權」。因為形成這種政黨「有滿途不可超越的障礙」。這種以為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便不會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理論，這乃是托洛斯基重複他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之反布爾塞維克的腔調，這種腔調是被列寧所打得粉碎的。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他起來反對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他說：

「那樣的聯合（指工農聯合的專政的政權——友）之實現的方法，或是由於有一個領導農民的資產階級的政黨，或是農民自己組成一個獨立的強有力的政黨。無論是這或是那，我們都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總結與前途，第二四面）

但列寧對於這一問題回答說：

「無產階級與農民之聯合，若以為「或是由於一個領導農民的資產階級政黨，或是農民自己組成一個獨立的強有力的政黨」，這無論由一般理論上或是由俄國革命的經驗上說，都是顯明的不正確的。階級的聯合，完全不是必要這樣或那樣之「強有力的政黨」。若以為要這樣，便是將階級問題與黨的問題混淆了。……只

要有「共同行動」的時候，這種聯合便可以實現，譬如工人代表蘇維埃與兵士代表蘇維埃，鐵路罷工委員會與農民委員會等，只要有這些羣衆組織，便在這些組織的共同行動中，實現了階級的聯合」。（「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之鬥爭任務」，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二七面）

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階級聯合，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是兩個階級的共同行動，這裡並不需要任何「這樣或那樣」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但是，托洛斯基反對列寧主義的這一理論，總是處處在找這樣或那樣的政黨，自然因此便不能找出工農民主專政存在的基礎。

八 托洛斯基現在罵共產國際「反動」，與一九〇五年他罵列寧「反革命」是一樣

第七，「共產國際之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應用之於東方各國的企圖，久爲歷史所推翻了，這個口號只能成爲一個反動的意義而已。這口號既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相對立，那他只幫助了無產階級之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混合，爲民族資產階級領導權和民主革命的失敗造成了優越的條件。把這口號引入之於共產國際綱領中，就等於對馬克斯主義和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之直接的背叛」。

我們對於托洛斯基這種空口的謾罵，應當指出兩點：

一、共產國際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文件中，無論對什麼國家，絕不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對立，絕不是說我們只要工農民主專政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只是指出，在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在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國家中，這裡首先需要完成民主革命，經過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而進一步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國際在全世界一切國家的任務，都是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之政權的建立。但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中，還有其本國的特殊經濟條件，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特殊歷史任務。這種任務在落後國家中，便是首先領導本國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有糊塗與反動，他才輕視無產階級之參加與領導民主革命，他才懷疑無產階級農民之革命的民主專政的口號（列寧），托洛斯基始終是：「忽視革命之資產階級的性質，沒有對於由這一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之過渡問題的明確觀念」（列寧），從一九〇五年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有一點變更。

二、托洛斯基在此地罵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動」，罵共產國際是「背叛」，這些與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中罵列寧為「反革命」是一樣的來源。我們看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寫的，他將孟雪維克與布爾塞維克看成一樣的東西，他說：

「孟雪維克由一個抽象觀念出發，說『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結果使無產階級

的策略，迎合資產階級的行為，以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布爾塞維克由同樣的抽象觀念出發，「革命是民主的，不是社會主義的」，結果是要使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仍然使他自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範圍以內。……當着孟雪維克的反革命性在現在已經表現出來的時候，而布爾塞維克的反革命性（注意——友）却要在革命勝利以後，將有非常大的危險」。——（托洛斯基，「一九〇五」，第二八三，二八五面）

托洛斯基當時罵列寧布爾塞維克之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自限」，是不做無產階級革命，說布爾塞維克到民主革命勝利的時候，一定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會「反革命」，「將有非常大的危險」。我們將他這些話與現在罵共產國際的話來比較一下，對照一下，很顯然的可以看出，無論在原則上或是在口氣上，都絕對的沒有兩樣。相差的僅只是：以前直接罵列寧，罵布爾塞維克，現在則不得不戴着「列寧」，「布爾塞維克」的帽子，作為容易欺騙人的工具，以罵列寧所創造的共產國際而已。

九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否認了革命發展的一切過渡階段

第八：「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在其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有不可避免的而

且又迅速的侵犯資產階級財產權的任務放在他的前面。民主革命之迅速的轉而為社會主義的革命，那這革命也就成為不斷的革命了」。

在這一段話中間，托洛斯基並沒什麼新的發明，只不過重述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錯誤而已。

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在他開始領導農民奪取政權的時候，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政權也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開始即使是取得政權的勝利，「還是不能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做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來的，民主革命是不能直接逃出资產階級社會經濟範圍的」（列寧）。「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沒有革命發展的許多過渡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列寧）。所以在民主革命中，當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開始取得的政權，這只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只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由工農民主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發展中，雖然無產階級的政策是要使他盡量迅速的轉變，但他究竟存在着——即使是很短的——一個轉變的過渡階段，只有托洛斯基不明瞭由這一革命到那一革命的過渡時期」。革命當然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但托洛斯基若將「不斷」的意思，看成沒有過程，看成民主革命可以與社會主義革命混合為一個，這便是「跳越」革命，而不是馬克斯主義不斷革命論的真正內容了。

十 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勢和一個國家能否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

第九：「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之奪取，並不是革命的結束而是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國家的和國際的規模上才有可能。這種鬥爭在國際資本主義關係之極端優越的條件之下，便能不可避免的引起大的爆發，爆發於內部的是內戰，爆發於外部的是革命戰爭。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就在這裡，不問他是昨天剛在進行民主革命的落後國家的問題，抑是經歷了長期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時代的舊式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

很慚愧！對於這一段話我已經反覆讀過好幾次，但始終還不能瞭解其真正的意思。我自然不敢說托洛斯基這一「大文學家」寫得不通，只怪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的翻譯，並沒有將他的意思傳出來。我又仔細看了幾次，不揣冒昧，我想大概托洛斯基的話是這樣：

「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之奪取，並不是革命的結束而是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許多）國家和國際規模上（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才有可能。這種鬥爭在國際資本主義關係（對於革命）之極端優越

的條件之下，便能不可避免的引起大的爆發，爆發於（各國）內部的便是（國）內戰（爭），爆發於外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戰爭。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就在這裏，不問他是昨天剛在進行民主革命的落後國家的問題，抑是經歷了長期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時代的舊式資本主義的國家問題」。括弧裏面的字是我加的，我覺得原文應該加上這些字纔能講得通。假使我這個義務校對並不失去托洛斯基的原意，那麼，我便將這一條與下一條的問題一併回答，因為這兩條是同樣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

下一條是：

第十：「欲在一國之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生產力之超過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因此，一方面就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另一方面引起了歐洲聯邦的空想。在一國範圍內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後發展到各國，復由各國發展到全世界。這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一個字的新的廣泛的意義上成了一個不斷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我們地球上新社會得到最後的勝利以後才有完成的可能」。

在這兩段話中，表示了托洛斯基反對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理論，托洛斯基以為無論在什麼國家中，既然開始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則必然便要「不斷的」引

起其他國家之同樣的革命。於是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工作，看成必要候世界革命。在國際規模上爆發以後才有可能，因此，在目前世界革命還沒有完全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還僅在蘇聯一國實現的時候，便不能說社會主義的勝利，便反對在蘇聯一個國家中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托洛斯基的理論，一則曰「現在生產力超過了民族的國家的界限」，因此便將世界經濟上目前還存在的還有重大影響的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民族劃分都完全拋棄；再則曰「在一國範圍內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後發展到各國，後由各國發展到全世界」，以爲這就是「不斷革命」，而不知道在這個中間尚有一個一定的過程。革命發展的趨勢是不斷的，但「不斷」的意義是要馬克斯主義的科學的在發展前途的意義上去瞭解，而不能機械的以爲不斷的意思便是：「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後天又在那裏」，將歷史的發展看成非常單純的，平坦的，一直的道路，這是完全離開馬克斯主義之辯證法的無論如何的「不斷」，其中終有一定的過程，托洛斯基始終是不明瞭歷史發展上之各種過程的。列寧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斯主義者，但列寧觀察世界經濟的發展便完全不是這樣。列寧說：

「無論那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無論那一個學過近代普通科學的人，我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能夠按照同等的步驟或和諧的比例麼？」答覆這個問題將無疑義的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沒

有同等的步驟，從沒有和諧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夠有。每個國家發展，特別偏向於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或特別顯著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某一種特性或某幾種特性。發展的過程是不劃一的。……全世界的歷史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去的。但所走的絕不是平坦的，單純的，一直的道路。（「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八三—一八四面）

正因為列寧認識了「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的規律」，所以列寧便與托洛斯基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列寧認為「因此得到結論，就是首先在幾個國家或者甚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托洛斯基以為社會主義必需在全世界範圍內同時得着勝利，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首先在一國或者幾國得着勝利。這一托洛斯基主義與列寧主義的爭論，並不是現在纔發生的，還當列寧生存的時候，還在十月革命以前，當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戰中，托洛斯基當時擁護「世界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列寧便是極端反對的。列寧說：

「將世界聯邦共和國看成一個獨立的口號是不正確的。第一，這個口號離開了社會主義，第二，由這個口號可以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以為在一個國家——對於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論歐洲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三三四面）

接着列甫更顯明的說：

「經濟的和政治的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之必然的規律，因此便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勝利首先在幾個甚至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可能的。已經勝利的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開始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吸引其他國家的被壓迫的羣衆接近自己，在他們那裏鼓起暴動反對資本家。（同上）」

當時托洛斯基在他的機關報「我們的話」（真巧！那時候俄國之反列甫的托洛斯基主義的機關報叫這個名字，在現在中國也是一樣的）上，對於列甫這種意見是絕對反對的，他說：

「以爲社會主義革命有民族範圍內的前途——這不是做了狹小民族觀念的犧牲者，這就組成了社會愛國主義的實質」。

這是托洛斯基於一九一五——一六年罵列甫的話，我們在以後可以看見現在托洛斯基對於共產國際，對於「史達林」的辱罵，與這完全沒有兩樣。

十一 托洛斯基否認世界各個民族中之政治上與經濟上的

特點，因此否認一個國家首先勝利的可能

第十一：「根據上述世界革命之發展的計劃，由現在共產國際綱領之以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來劃分社會主義『成熟』與『不成熟』的問題，已被推翻了。資本主義既經形成了世界市場，國際分工和生產力，那他就為社會主義之重新建設預備下了世界的經濟。各國之在這過程中的推進，有各種不同的程度。落後國家在某種條件之下能夠迅速的達到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之向社會主義的推進，則較為遲後。一個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因其無產階級沒有聯合農民和奪取政權的充分準備，就不能澈底的完成其民主的革命。反之，在無產階級因民主革命的結果而奪取政權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未來的命運，不僅有賴於一國生產力之最後的分析，且有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我們看托洛斯基這一段話，包含了許多無常識的錯誤與矛盾。

一、托洛斯基說共產國際綱領有「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是「劃分了各國社會主義之『成熟』與『不成熟』的條件，他這幾句話是對着共產國際之以下這幾句話說的：

「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形加重。此種不平衡，引起資本主義形式之不同，引起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不同，更引起革命過程中各種不同條件或特殊條件。這些情形使無產階級之獲取政權，在歷史上必然要採取各種不同的路線與速度，使有些國家在向無產階級專政走去時，必須經過某種過渡階段，並且使各國建

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也不相同。（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通過的綱領，第四章「無產階級專政」第八節）

我們看共產國際這種分析，完全是與列寧之論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絕無兩樣，完全是根據於列寧之「經濟的政治的不平衡發展，是資本主義之必然的規律」，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沒有同等的步驟，從沒有和諧的比例，而且也不能夠有」（列寧）。因為：「全世界歷史是定歸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所走的絕不是平坦的，單純的，一直的道路」（列寧）。這種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托洛斯基無論如何是不能瞭解的，他只機械認識了「國際分工」，「世界市場」，他不知道因其不平衡的發展便必然引起各種不同的條件，便使社會主義勝利之成熟的條件在世界各地便一定有區別。

其實托洛斯基自己也寫着「各國之在這種過程中的推進，有各種不同的速度」，然則「各種不同的速度」是由那裏來的呢？他若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便必然是從經濟發展中產生出來。既然各國的經濟發展，可以使各國到社會主義有各種不同的速度，當然這便有經濟條件之「成熟」與「未成熟」，但托洛斯基偏要說這是「迂腐的無生氣的精神」，其矛盾簡直無從解釋！

二、托洛斯基以為在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中，「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未來的命運，不僅有賴於一國生產力之最後的分析，且有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假使是說，只有普遍的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使某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勝利，得着最後的鞏固，這自然沒有錯誤。但托洛斯基不是這樣，他是說若沒有國際的社會革命，則某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簡直沒有「未來的命運」，這就是說，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之普遍的爆發與勝利，則談不上某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落後的國家——的勝利。這在理論上的不通，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尤其當蘇聯存在十三年以後，當蘇聯經濟建設正突飛猛進的時候，這是絕對不正確的。自然，關於這一問題是與在蘇聯在一個國家中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有密切聯系的，我們且看托洛斯基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

十二 列甯說在俄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托洛斯基說不可以

第十二：「由不滿於十月革命的反動的酵素之上，形成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之理論，是與不斷革命論完全相反的一種理論。在我們批評的打擊之下，想把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應用之於俄國一國，說俄國具有特殊的條件（即地大物博的條件），這種無恥的企圖，並沒有把事情改進，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把社會主義從國際的地位下分離開來，往往會形成一個民族自救主義，就是說，承認他自己的國家有例外的優越

權和特殊條件，將允許他發生一種爲別的國家所不能得到的作用。世界的分工，蘇聯之有賴於外國技術，歐美先進國之有賴於亞洲的原料，……這是使任何一個單獨國家都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

這一段托洛斯基主義的理論，是他目前反對共產國際及反對蘇聯的中心思想。他罵共產國際是「民族自救主義」，這與一九一六年罵列寧爲「狹小民族觀念的犧牲者」是一樣。托洛斯基之這些「反動的辭彙」，「無恥」，「民族主義」等等名詞，是用以罵誰的呢？表面上看來是罵現在的共產國際及所謂「斯達林」，事實上自然完全是向列寧主義的進攻。因爲我們在上面已經引證了，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有社會主義首先勝利的可能，這是列寧的理論而不是其他別人的。列寧不僅說了一般的理論上的可能，並且特別指出俄國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並且指出俄國必要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在開始提出電氣化之口號的時候，他說：

「沒有電氣化的計劃，我們轉入於真正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的電氣化」。〔列寧一九二〇年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

在另外一個地方，在「論糧食稅」這一小冊子中，列寧說：

「我們是否想由現在俄國這一種普通的狀態直接轉入於社會主義呢？是的，我們是想的，但僅只在一個條件之下，我們經過了許多的科學的工作，到現在便知道了。」

這個條件便是——電氣化」。〔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冊，第二〇四面〕

這裏，列寧說俄國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是電氣化，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便是共產主義。我們再看，在列寧將死之前的最後的著作上，列寧說：

「事實上，一切生產工具歸國家、國家政權握在無產階級之手。整千百萬的農民小生產者與無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對農民保障着自己的領導地位，等等，……難道所有這些不是建設完全社會主義之必要的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建立，但所有這些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之必要的並且已經足夠的條件」。〔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冊，第一四〇面〕

我們只由這些引證上便可以看出來，托洛斯基之一個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及「民族觀念」，「反動」，「無恥」等等毫無理由的謾罵，都是對着整個列寧主義的進攻，絕不僅是對於現在共產國際的問題。

托洛斯基爲什麼不相信在俄國——在這個無產階級已經取有政權十三年的國家——來建設社會主義呢？除了因爲托洛斯基之不明瞭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的規律以外，還有一個很主要的來源，這就是托洛斯基不相信無產階級可以與農民合作，不相信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譬如當一九一九年的時候，當俄國革命已經成功兩年以後，當列寧正在說無產階級聯合中農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托洛斯基在他「一九〇五」這一

本書中，他寫着：

「無產階級正因為要保證自己的勝利，所以在他自己取得政權的第一天，他不僅與封建勢力並且要與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進行嚴重的鬥爭。在這時候，無產階級不僅與這些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曾經幫助他進行革命的各派資產階級發生仇視的衝突，並且同樣要與隨着他共同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嚴重的仇視的鬥爭。

在落後的國家中，工人政府與佔大多數人民的農民羣衆的衝突，僅只有在世界範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才能得着解決」。——一九〇五，序言」

就在這同一個時間與同一個空間中，當托洛斯基將農民的私有制度與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擺在一塊的時候，當托洛斯基高喊「無產階級應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嚴重仇視鬥爭的時候，列寧在布爾塞維克黨的第八次大會上說：

「我們對於資產階級及對於中農（即農民中的大多數——友）之基本的區別就是——完全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而與不剝削別人的中農聯合。這一個基本理論是所有人都應該承認的」。——（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一四六面）

從第八次大會以後，在俄國便開始了列寧之無產階級聯合中農的路線，以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托洛斯基既然覺得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馬上便應該與農民發生「仇視鬥爭」，則自然托洛斯基不能看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前途了！

十三 對共產國際之一些毫無根據的謾罵

第十三：「斯達林與布哈林的理論，不但把民主革命機械的對抗着社會主義革命，違反了俄國革命的經驗，又把民族革命從國際的路線上分離開來。此種理論只使落後國的革命來從事建設一個不能實現的民主專政的制度的任務，這種制度不但反對了無產階級的路線，在政策上引入了許多的幻想，且麻醉了東方無產階級的力量，並阻礙了殖民地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之對於政權的奪取，站在那種可恥的理論的觀點上看去，即表示了革命的完成（照斯達林的公式已完成了「十分之九」）及國家改良時期的開始。富農生長之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資產階級「中立」的理論，是與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分不開的。他們站在一起，沒落也是在一起的」。

托洛斯基的這一段話中，完全是絕無根據的謾罵，沒有任何證據與理由的。我在這裏必須說明三點：

一、共產國際在任何時候，對任何殖民地革命運動中都沒有「把民主革命機械的對抗着社會革命」。共產國際認定目前殖民地革命是民主革命，但這是指出目前這一階段之特殊的歷史任務，其將來的前途當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祇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嚴格的研究了民主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使前者幹到徹底之後，他們即

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一唯一革命的及唯一馬克斯主義的政策」（列寧）。托洛斯基以爲無產階級參加了民主革命便是「麻醉了東方無產階級的力量，並阻礙了殖民地革命的勝利」，這不獨對列寧主義沒有一絲一毫的常識，並且是列寧所認爲「只有糊塗與反動」的理論。

二、無產階級對於政權之奪取，當然表示革命完成之最大的一部分。這爲什麼是「可恥的理論」，爲什麼用「施達林的公式」來掩飾問題之真正的內容！我們看二月革命後，列寧是怎樣寫的。在「論兩個政權」這篇文章的第一句，列寧說：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總是國家政權的問題。倘然沒有認清這，那就講不到什麼自覺的參加革命，更說不上什麼領導革命了」。（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冊，第二四面）

在「論策略書」上，列寧講二月革命的總結說：

「自這次革命以後，政權轉到別個新階級——即資產階級之手。照革命的嚴格科學意義以及實際政治意義上講來，國家政權從這一個階級轉到別一個階級，是革命的第一個根本的主要標誌。因此，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已經完結了」。（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冊，第二八面）

列寧不僅說了奪得政權是革命完成的「十分之九」，並且說是「已經完結了」，這

有什麼「可恥」?! 只有托洛斯基主義者，不明瞭政權在革命中以及在一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才做出了極端機會主義的結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不建設社會主義」。這纔是「自限」呵！這纔是「反革命」呵！托洛斯基時常用絕無根據的以謾罵別人的名詞，拿來自己罵罵自己，是再適當沒有的了。

三、「富農生長之於社會主義」和「世界資產階級守中立」的理論，與共產國際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與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更是全不相干。果然有了這樣的理論，共產國際一樣將要以肅清托洛斯基主義的手段來對付他。將這種理論絕無根據的冒加於共產國際身上，這是官僚式的最無恥的誣賴與造謠。

十四 托洛斯基要一手掩盡二十年之列甯親身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

最後，第十四：「布哈林一手創造的共產國際的綱領，完全是含有折衷主義性質的。想把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馬克斯主義的國際主義相調和，而不知道這和世界革命之不斷性是分不開的。左翼共產主義者反對派的鬥爭，為的是爭正確的政策和健全的共產國際，他與爭取馬克斯綱領鬥爭有密切的聯繫，關於綱領問題絕不能與兩個相對的問題——不斷革命論與一國社會主義論——有所分離。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也

不復存於列寧與托洛斯基之一時間的分歧意見中，因為這種分歧的意見已為歷史所完盡了。這裏只有馬克斯與列寧之基本思想對於中央派之折衷主義的鬥爭。」

在最後這一段的「結論」中，托洛斯基寫了世界最無原則最無恥最欺騙人的話頭。他們反列寧關於民主革命基本理論，反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反對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反對資本主義之不平衡發展的理論，反對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他將列寧主義中的主要問題都反對完了，但他還依然要戴着「列寧」的旗幟，還說他是「擁護馬克斯與列寧的基本思想」。尤其是最無恥的，他將列寧親身二十年反托洛斯基的鬥爭，完全輕描淡寫的模糊過去，說這是「一時間」（這個「一時間」不很長），前後計二十餘年）的「分歧意見，說這「已為歷史所完盡了」。這真是笑話！當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大會的時候，開始第一次表現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分裂，托洛斯基便與孟塞維克站在一齊，共同的反對列寧。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斯基公開宣傳自己的不斷革命論，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屬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革命」。反動時期俄國黨發生了取消派，托洛斯基開始是所謂「中間」的調和派，反對列寧向取消派進攻，以後托洛斯基又將一切取消派聯合起來，組織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八月聯合」，托洛斯基是其中的領袖。一九一二年以後新革命高潮開始以後，托洛斯基主張「俄國工人鬥爭歐洲化」，學習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反對列寧之革命進攻的策略。世

界大戰開始以後，列甫提出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要使本國資產階級失敗。托洛斯基認這種口號是「幫助敵國帝國主義」。第二國際破產以後，列甫主張創造新的第三國際，托洛斯基與考次基聯合一齊組成爲「中派」以反對左派的列寧。二月革命以後，托洛斯基看見了革命高潮與布爾塞維克勢力的擴大，才開始加入布爾塞維克，並企圖保持自己的小組織而沒有成功。在十月革命後之布列特特和約的時候，列寧主張和平不戰爭，托洛斯基主張「不和平不戰爭」。一九二〇年開始轉變於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托洛斯基提出了他的「職工會行政化」的計劃，使工會與經濟機關併合起來，列甫罵他爲變工會爲官僚主義的企圖。這是列甫在世以前所親身領導的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重要鬥爭，這顯然的充滿了整個列甫主義發展的歷史。列甫死了，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當然不會終止，一直到現在，將托洛斯基主義整個的驅逐於共產國際及聯邦共產黨之外。這一系列寧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之前後卅十年的鬥爭，托洛斯基偏說這是「列寧與托洛斯基之一時間的分歧」，這豈不是世界上最無恥的表示嗎？！托洛斯基並說「這種分歧的意見已爲歷史所完盡了」，這簡直完全沒有馬克斯主義常識的話，列寧反托洛斯基之數十年的鬥爭，在整個列寧主義發展的歷史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托洛斯基企圖以一手掩盡歷史的事實，但這無論如何是不會被其掩飾的。「歷史所完盡的」是什麼？我看「歷史所完盡的」只有托洛斯基主義之無條件的全部的破產。

什麼是托洛斯基之「不斷革命論」的歷史呢？他就是不斷向列寧主義進攻的歷史，也就是他自己（托洛斯基主義）不斷破產的歷史。

最後，托洛斯基主義這一「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到中國有什麼作用呢？這便是反對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反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十大政綱，反對推翻國民黨與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反對正在發展的普遍全國農村的土地革命，這是什麼？除了說他是取消派以外，實在不會有再適當的名詞。

列寧有一段批評托洛斯基主義最適當的話，這一段話我已經幾次的引證過，因為這句話是對托洛斯基主義之最正確最深刻的批評，尤其特別適合於指出托洛斯基主義在目前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因此我可以再將這一段話作為我這全篇的結論：

「托洛斯基以及一般托洛斯基主義者，妥協主義者，他們比一切取消主義者都更要有害些。因為在工人階級前面揭露取消派的錯誤是比較容易的，只有托洛斯基先生們，慣弄些為工人羣衆所難於瞭解的東西。一切幫助托洛斯基派的人，他的政策都是欺騙工人的，掩飾取消派的。讓普特列紹夫（當時俄國取消派的領袖——友）在俄國完全自由的活動，在他們外表上更增加一些「革命的」語句——這就是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質。」（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冊，第三五九面）。

一九三〇年全中國五一運動的總結

澤鴻

一 全國五一運動的客觀形勢

今年全世界的五一運動，在國際的客觀形勢之下，表現着他偉大的歷史意義。正如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所分析：戰後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徵是：根本的內部與外部的矛盾之加劇；這種矛盾，目前表現於資本主義加速的崩潰，表現於國際無產階級鬥爭之革命潮流的深入與擴大，同時表現於殖民地民族運動的發展。最顯明的例證是：世界大戰危機的緊迫，帝國主義者所召集的海軍會議，充分表現帝國主義間正在加緊準備世界大戰，表現軍備競爭的緊張，特別是進攻蘇聯的危機。在帝國主義間一致的採取各種方式（從中東路事件到反宗教問題等）向蘇聯挑釁，積極的武裝圍繞蘇聯的各小國，企圖消滅世界革命，消滅蘇聯。這一企圖，正從世界的全部政治經濟危機中反映出來，同時加深了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更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內新的革命浪潮之興起。許多地方，工人羣衆向資本主義猛烈的反攻（如：魯爾，洛茲，法國的紡織工人，美國南部及孟買罷工）。以及不斷的示威與騷動（如：法國的示威，柏林及波蘭等的示威），特別是全世界工人逐日加增的失業恐慌，三月六日國際失業工人的偉大示威運動，與在業工人鬥爭聯系着的發展，更促進世界革命浪潮之加速發展。東方

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在印度，安南，朝鮮，緬甸，菲列賓……都有空前的發展，印度已經達到革命高潮，蘇維埃的印度，正在滋長。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加速的成功，更成爲世界革命鞏固的中心基礎。帝國主義，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以至托洛斯基派的騙子們，正恐慌萬狀，企圖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所以特別加緊組織世界白色恐怖，加緊改良主義的欺騙，尤其是加緊從各方面向蘇聯進攻，（如：釋放白黨，製造假鈔票，與波蘭訂約以進攻蘇聯，組織蘇聯國內技師，陰謀破壞鐵道礦山等等）。

全世界偉大的五一運動，動員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苦羣衆，向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及社會民黨工賊們，熱烈的反抗。特別是柏林十餘萬人的示威與武裝衝突，巴黎，倫敦，紐約，各幾萬人以至十餘萬人，在東京亦破天荒的動員了一萬六千人，這些世界中心城市的示威，與赤都莫斯科八十五萬人的示威相呼應，表示出世界革命浪潮的發展，全世界的革命高潮，迫切在我們眼前。各大中心城市工人階級積極的鬥爭罷工，示威，騷動，將成爲世界革命高潮到來的主要標誌。

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同時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最薄弱的一環。世界革命第二個高潮有首先在中國爆發，掀起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炸裂全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可能。

全中國的五一運動，不但是與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危機相適應，與全世界的五一運動

相配合，成爲世界革命浪潮的一支巨流。同時，中國的五一，正當着全國經濟危機日益尖銳，工業農業驚人的繼續破產，廣大的災荒與失業的蔓延，造成全國經濟生活中非常嚴重的現象。在政治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不可調協，軍閥制度衝突的尖銳，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各派的對抗，造成不斷的軍閥混戰，整個中國都捲入了戰爭的漩渦。

一方面在軍閥混戰的過程中，削弱了反動統治的力量，另一方面特別加深了廣大羣衆的痛苦，驅使廣大的羣衆，葬身於砲灰之下，或是活活的凍死，餓死，累死，飽受着戰爭災禍的壓迫剝削而死。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下，逼使着廣大羣衆從鬥爭中去找尋出路，城市工人的罷工，示威，以至武裝衝突，到處爆發，特別是上海「三八」幾千人的莊嚴示威。祥昌，電燈泡廠的慘案，北寧路南廠工人打死黃色委員；武漢一紗，福源，裕華，紗廠工人驅逐黃色領袖，與軍警肉搏；青島工人反對關廠，反對工整會的鬥爭；滿洲中東路失業工人的鬥爭；這些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猛烈的向前發展，一起來便是嚴重的政治鬥爭，以至武裝衝突，衝破了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更縮小了改良主義黃色工會在羣衆中的影響。農村土地革命，更有驚人的發展，農民羣衆的暴動以及游擊戰爭，從南方漸漸向北方發展，不但江西六十縣，湖北五十縣，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各有幾縣以至一二十縣發生農民暴動，在江，浙，豫，直，滿亦逐漸有游擊戰爭或者農民的騷動。蘇維埃的政權，幾乎普遍了南中國各省的鄉村，豪紳地主的統治，在

這些省份縮小到幾個城市，實際在中國的半部，形成了兩個絕不相容的政權對抗着。

反革命軍隊中的士兵羣衆，被軍閥的殘酷壓迫、沒有出路，土地革命的吸引，將他們從反動的軍事系統中叛變出來，投到紅軍中去，兵變隨着軍閥戰爭的延長與擴大而繼續的發展，普遍全國，在戰爭的前方與後防，造成了中國革命浪潮的支流；這樣的兵變發展着，更促成了軍閥制度的崩潰，同時生長成爲工農革命一支有力的隊伍。中國特殊的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紅軍，得着猛烈的發展，朱毛之後繼續生長了千數的「朱毛」，樹立起工農革命的武裝基礎，敵人每天高喊着「剿滅」，然而却愈剿愈多。這四大動力，推動着全中國的革命向前發展，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全國五一運動中黨的任務，正如中央七十一號通告中所指出的：

「黨的任務，便是要堅決的去組織偉大的政治鬥爭，以匯合各種革命勢力，特別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形成全國的偉大的總的革命鬥爭，推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的到來，并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首先勝利」。

就在這一客觀條件之下，所以組織全國五一政治示威有非常偉大可能，並且是目前全黨促進革命高潮到來之總的任務中一個最具體的工作。

二 全國五一運動中各黨派的策略

在全國五一運動中，更表現着中國兩個極端尖銳的營壘之陣容。一個是反革命的營壘，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國民黨改組派一直到取消派的工賊們。他們一致壓迫和破壞全國五一運動。南京國民黨政府採取高壓屠殺與欺騙的手段。前方軍事吃緊，後方禁止罷工罷課以及一切羣衆的集會，他們造謠說：「共產黨在五一要暴動」。藉這一理由，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資本家，一致的舉行高壓。南京「四三慘案」，上海「四八慘案」，哈爾濱及北京的大批拘捕，江西，雲南，武漢，四川，奉天，天津，香港，廈門，南京，一直到上海「四二七」羣衆代表大會，均發生廣大的逮捕革命戰士的事實，各地的軍事戒嚴與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同時南京政府，老早通過五一停工，叫工人到家裡開會或休息，不准出外示威。更經過黃色工會的破壞與欺騙，和緩羣衆鬥爭，消滅五一運動。

改組派更兇險的到羣衆中去活動。他們利用半在野黨的地位，蒙上一層欺騙的面具，專門企圖拉攏羣衆作反蔣的陰謀，企圖取蔣而代之。他們特別或出容易欺騙羣衆的口號，取得羣衆的力量，以爲他們進行軍閥戰爭的工具。但他們實際上是非常恐怕羣衆力量真正壯大起來，他們已經高唱着：「澈底反俄反共」的口號，他們已經與帝國主義資本家以及閻馮各派軍閥勾結着，到處屠殺羣衆。因此，改組派在五一運動中，雖然企圖召集羣衆會議，企圖利用羣衆要求武裝暴動的心理，組織軍事陰謀，在後方打

擊蔣系軍閥以幫助其他的反蔣軍閥；然而在羣衆鬥爭前面，使他們完全失敗。

取消派陳獨秀劉仁靜區芳各派，在全國五一運動中，政治上組織上都劇烈的宣佈破產，他們眼巴巴的望着革命浪潮，既跟不上，又拉不住。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咀咒黨的「盲動」，他們便坐在屋裏，指揮馬玉夫等幾個小嘍囉到羣衆中去要羣衆作合法運動，不要鬥爭。區芳等托洛斯基派發出通告，他們在通告中寫着：「各地反對派應當號召工人羣衆在工廠門前舉行非常集會，使「富農派」，（他們無恥的屬黨的特別名稱）的示威完全沒有工人羣衆」，「在我們指導下之工人組織（那裏有半個工人！）并力爭五一停工一天的實現」。托洛斯基派不敢提出示威的口號，不敢說五一工人罷工。他們的目的是幫助國民黨使工人羣衆離開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破壞工人參加五一運動。他們與國民黨異口同聲的喊出「停工一天」，以分散羣衆的力量。取消派本來沒有羣衆，他們在五一那天，不但沒有舉行任何一個非常集會，在上海他們到南京路去拉示威羣衆到茶樓上「吃茶」，他們向示威羣衆說：「你們在這裏送死，走！去吃茶去！」！羣衆一陣「帝國主義的走狗」！呼聲，將他們驅逐去了。阜陽示威中，取消派份子掛出孫中山遺像，企圖污蔑示威羣衆，要羣衆和他們一樣無恥的投降國民黨。這是何等明顯的卑鄙的行動！但同樣被羣衆將他們驅逐出去。

另一個營壘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兵士，貧民，以及僑居中國的少數被

壓迫民族的羣衆。黨依據五一運動當前的客觀形勢，提出全國罷工，罷課，紀念五一的口號，指出組織政治罷工爲五一示威最主要的骨幹，動員全國黨員和團員，經過赤色工會農會學生會的組織，建立各地以及各廠各校的五一籌備會。發展赤色工會，建立工人糾察隊，獨立的運用公開活動路線號召全國五一示威，在農村中與組織地方暴動的策略聯系，在兵士中與組織兵變的策略聯系，在紅軍中與猛烈擴大紅軍的策略聯系，黨的目的是在組織全國五一運動以促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

三 全國五一運動的經過

全黨都在這一路線之下動員，動員的結果，的確有偉大成績的收穫。據我們已經得到書面報告的統計，其內容如下：

一、從準備到五一，已經有報告者：

中心城市：上海，香港，武漢，哈爾濱，天津，唐山，北京，廈門，廣州，海口，

啓東，江陰，蕪湖，安慶，龍井村，年陽。

鄉 村：溫州，王田，滋縣，延吉，南通，六安，德安，文昌，瓊山，湖口，定

安，會樂，東江，海陸豐各縣。

二、五一的罷工：上海英界電汽車，江陰整個紗廠，啓州整個紗廠，海口印刷工人

三、五一罷課：

，延吉洋機，印刷，挑水，鐵工，土木等工人，北京印刷工人，唐莊子礦工人等。

上海幾校，延吉廿餘校，阜陽十三校，廣州美中，北京清華，天津中日，等校。

四、五一示威的羣衆：

地名	基本羣衆	參加示威的羣衆
上海	二千多人	二萬多人
香港	二百多人	未統計
武漢	一百多人	同上
哈爾濱	一百多人	一千多人
廈門	二百多人	五百多人
江陰	四百多人	未統計
啟東	六百多人	一千多人
阜陽	二千多人	三四千人
廣州	幾十人	未統計
天津	一百多人	五百多人

唐山(限於外礦)二千多人

未統計

玉田

幾百人

同上

磁縣

幾百人

同上

六安

十六萬人

同上

廬山

幾萬

南通

六萬

加上各紅色區域，當在一千萬以上，影響的羣衆，未列入統計。

五、五一攻下的城市：

五華，湖口，宜安，黃老門車站……

六、五一的宣傳品，其有報告者：

上海 三百萬

香港 二十餘萬

武漢 十二萬

七、五一運動黨與赤色工會的發展：

黨的發展：上海四百餘人

唐山外礦五十人

北寧路南廠與天津各數人

北京十餘人

香港十四人

工會的發展：上海幾百人

香港四百餘人

糾察隊的發展：上海二百十人

香港百人左右

唐山七十人

武漢幾隊

天津十五人

（此外青年團，童子團的發展，五一籌備委員會，未統計。）

從這一簡單統計上看出，今年全國的五一運動，普遍了全國中心城市與鄉村，這種廣大的動員，超出「五卅」與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新紀元。

四 全國五一運動的估計

人們對於今年全國五一運動，發生兩種極不正確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是從組織上出發，他們單舉出數目字來反證說，今年全國五一罷工，示威、以及組織上的發展，仍不廣泛，甚至有少數地方，被捕和開除的黨員比新入黨的黨員更多；因此，他們的結論是五一運動很少成績，或者甚至說失敗了。

第二個觀點，是單就五一示威來立論，不從整個五一運動過程着眼，他們說示威人數並沒有比以前增加得多，有些地方連示威都流產，這有什麼成績？他們和第一個觀點一樣的結論，五一是一失敗了！

這兩種庸俗的觀點，與取消派毫無二致，他們所得的結論，完全不合事實，這樣的結論，只有使他們動搖，懷疑，使廣大羣衆對他們失望。

我們從整個革命形勢與五一運動的全部過程中觀察，雖然今年全國五一運動未能完全令人滿意，未能達到客觀形勢的要求與容許的限度的完滿目的；但是全國五一運動是成功的，只能說這些成功，有許多「美中不足」。

我們單從主要的幾個問題上來估計，便知道我們獲得了偉大的成功。

一、全中國的五一運動與全世界的五一運動打成一片，這是開闢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配合聯繫的先例。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得到世界革命的配合，帝國主義封鎖武漢，消滅上海暴動的勝利，包圍葉賀軍，以至摧殘廣州蘇維埃，當着這樣緊急的關頭，英法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內與所屬殖民地革命，未能起來，以

我中國革命只在蘇聯的幫助之下孤軍作戰，卒至失敗在帝國主義及其所羽翼下的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手裡。現在，完全不同於一九二七年，國際的革命浪潮，在資本主義的國內與國外，正在發展，與中國新的革命浪潮密切的聯系着，將平衡的配合着，表現在今年全世界的五一運動中，非常明顯。這是中國革命將要在全世界階級最後決戰當中取得完全勝利的特徵。

二，全國五一運動，匯合了各種革命勢力——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兵士暴動，紅軍發展，貧民鬥爭——推進着中國革命的更向前發展。我們看見，五一後，全國的農村比以前有更大的變化，南方各省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蘇維埃很迅速的擴大，平江，瀏陽，修水，大冶，黃石港，沔陽，六安，……的縣城，發生了暴動，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紅軍的發展，至少在一倍以上，順直的直南與京東，從新出現三軍紅軍，遊擊戰爭正在發展與擴大，遼寧的延吉鄉村，亦爆發了農民的暴動。兩個政權的對抗，日益尖銳，國民黨政權日趨削弱與破產，蘇維埃的政權，逐日深長着。士兵的叛變與暴動，在軍閥戰爭的前方與後方，無限制的擴大。貧民反捐稅，鬧米荒的鬥爭，普遍到各省。特別是工人階級的鬥爭，劇烈的與日增長：上海自英界電汽車同盟罷工勝利後，油漆罷工，美亞同盟罷工，法界水電罷工，榮昌火柴廠罷工，江南造船廠罷工，永裕紗廠罷工，裕民糖廠罷工，端緒鐵廠罷工，黃包車夫罷工，電話的罷工，……罷工的浪潮，在

上海每天發展着。廣東，粵漢路工人怠工，潮汕船夫同盟罷工，武漢紗廠，碼頭，兵工廠工人鬥爭，唐山，天津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青島工人反對關廠，要求增加工資，反對國民黨工整會的罷工以至示威，同樣猛烈的發展。這些工人的鬥爭，一起來，便是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首先便要衝破武裝進廠，拘捕與屠殺，經過嚴重的政治鬥爭，才能爭得經濟條件的勝利，武裝衝突與流血，到處發生，成爲工人鬥爭在目前形勢下的特點。這是革命高潮到來的信號，將發展成爲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標誌。

三、全國五一運動，不但在城市中有各種羣衆集會，講演，示威，游行，以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在鄉村中一樣的爆發各種羣衆的革命運動，紅色區域的武裝示威游行動輒是幾萬到幾十萬羣衆的動員，全國幾十萬的紅軍，赤衛隊，少年先鋒隊，都一致在無產階級與共產黨領導下參加這一運動。這又是第一次大革命所沒有的條件。第一次大革命當中，機會主義陳獨秀們，抑制農民運動，深怕農民「過火」行動，所以沒有引起廣大農民羣衆與工人有配合的積極參加第一次大革命，使工人階級失去他的同盟軍。

現在，完全不同於一九二七年的形勢，廣大的農民羣衆，非常熱烈的鬥爭着，在全國五一運動中，實行第一次全國城市與鄉村的總動員，這將是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演習，這一演習是完全成功。

四、全國五一運動當中，帝國主義一直到取消派都異常恐慌，他們高叫着：共產黨

「暴動」，「盲動」，他們動員了海陸軍，巡捕，警察，以至工賊，他們佈置了鐵絲網，機關槍，坦克車，他們檢查行人，拘捕示威羣衆，抄查共產黨與赤色工會等機關，他們到處散播謠言，說「共產黨要羣衆到街上去送死」，在上海五一前夜有外國海軍的示威，各地入夜斷絕交通，……這些事實，證明敵人的動搖無恥。廣大羣衆絕沒有被他們所懾服，反而激起了羣衆對他們的憤恨，拚死的反抗情緒。我們看見，今年全國五一的示威，不但調動千萬以上的革命羣衆，而且調動了敵人一切的武裝力量，演習了一次全國武裝暴動的對壘。

五、全國五一運動中，只看見到處是共產黨的活動，到處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羣衆運動與示威，很少看到國民黨黃色工會召集羣衆會議或示威，只有徐丹，上海，天津，青島，有幾十到百人的工賊和國民黨員在五一關在屋裡開會，簡直沒有半個羣衆參加。

這是很明顯的，比去年五一國民黨黃色工會到處召集羣衆大會相差懸遠。不但五一示威是如此，目前各地工人罷工，有幾個是黃色工會領導的？除山東，順直黃色工會在

羣衆中還有相當的力量，全國改良主義黃色工會在羣衆中的影響，隨着國民黨的破產，隨着黃色工會的法西斯蒂化，工賊化而日益縮小。這不是偶然的，這證明羣衆的日益的左傾，證明中國民主民族改良主義很快要送葬在革命的發展當中，了結他欺騙的過程。

六、全國五一運動，不但證明黨的路線完全正確，特別提高了黨在羣衆中的威信，

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便沒有五一運動。更明顯的是許多地方（如廣州）共產黨未能堅決的執行他的任務，五一運動便很少成績。共產黨在上海抓住了羣衆正確的情緒，克服了羣衆落後的情緒，然後才爆發了電車罷工，渡過了危急的關頭，取得勝利。上海工人自動的找老上海總工會，工聯會，找共產黨，香港工人怪赤色工會不通知他們去參加「四一三」示威，煙台看傳單的羣衆被捕後，自己承認是共產黨，各地工人罷工，多半是在共產黨領導或影響之下。這是表現共產黨成爲羣衆唯一的領導者，充分證明黨在政治上的成功。

七、全國五一運動當中，黨、團，赤色工會都有相當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新的共產黨的產業支部；上海，天津，北京，武漢，香港的黨都開始打進市政工人，交通工人中去建立起支部，特別是支部生活的建立，反右傾鬥爭的深入，有更多的成績。糾察隊，在幾個中心城市樹立起基礎，開始上海第一次成功的總檢閱，這些都是五一運動的收穫，將來革命勝利的基點，絕不能因其微弱而加以忽視。

以上是說明全國五一運動偉大的成功，這些成功是取消派和右傾份子所絕對不能了解的。我們讓他們去懷疑，動搖，咀咒吧！

四 全國五一運動中暴露出黨內嚴重的右傾危險

全國五一運動雖然獲得了偉大的成功，然而的確包含了許多弱點和缺點。很明顯的事實，全國五一運動的成績，與客觀形勢的要求和容許的限度相比較，相差甚遠。爲着五一的政治罷工，尙不多見；五一的示威，在中心城市調動的羣衆，尙不寬廣；五一籌備委員會在各廠各校的建立已經很少，又多屬於形式的；公開路線的運用，未能深入羣衆；糾察隊，赤色工會，黨，團的發展，很少成績；婦女與青年的工作，一般的注意得非常之少；特別是黃色工會有基礎的工廠，未能捲入罷工浪潮，根本消滅黃色工會；一般的政治宣傳鼓動，仍不充分；擁護全國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宣傳與行動，更是缺乏。這些缺點的主要來源，是爲黨內嚴重的右傾所障礙。

一、許多黨部或黨員對客觀的形勢估量不夠，他們對全國五一組織罷工示威的路線，發生懷疑。滿洲，廣州，順直，武漢黨內都有一部份人發生「除外主義」的口號。我們以滿洲爲例，看滿洲黨內一些黨員如何懷疑五一運動呢？

他們說：「滿洲羣衆政治水平線低，鬥爭經驗缺乏，黨和團的組織薄弱，因此中央七一號通告在滿洲不能實現」。

「滿洲可以組織五一政治罷工，但比關內更多困難」。

實際他們落在羣衆後面，哈爾濱「四一」到「四五」以後的鬥爭，立刻回答了這種不正確的估量。哈爾濱五一有一千餘人的示威，被右傾的份子幾乎斷送了，第一次沒

有發動，第二次用了很大的力量戰勝右傾份子之後才堅決的發動起來，搗毀日本領事館，到蘇聯領事館門前熱烈的喊出「保護蘇聯」的口號。

各地黨部，多半是發動工人經濟鬥爭聯系到五一示威，將五一示威與政治罷工分開，更是一般的現象。他們不了解，目前政治罷工的口號，已經變成了羣衆迫切的要求，沒有嚴重的政治鬥爭，便很難取得經濟的勝利。因為他們沒有以政治口號作中心去組織五一的罷工和示威，所以許多可能爆發罷工的工人，未能參加五一運動。

二、在農村中被富農意識所籠罩，在五一運動中，未能堅決的組織地方暴動，奪取城市。在東江，不加緊城市的工作，單純靠紅軍攻打城市，結果使羣衆受挫折感覺倦憊。在浙江，發生攻打杭州的觀念，而不加緊杭州城市的工作以及和上海的配合。農村黨的右傾（有的表面似左，實際仍是右傾），障礙農民暴動發展到最高形式——地方暴動。

三、紅軍中過去遊擊戰術的觀念，障礙着猛烈擴大的路線。他們有些部隊還是將所奪得的武裝分散給農民，還是在偏僻的鄉村，轉東擊西的作戰，還未能與當地的羣衆配合，奪取交通要道，向着中心城市發展，特別是朱毛紅軍第四軍，表現得明顯。

四、在士兵運動中，還多停留在士兵的日常鬥爭與組織兵變，還未能堅決的提出「組織兵士暴動」，領導兵士與當地工農配合奪取地方政權。在軍閥戰爭的陣綫上，發

動的兵士鬥爭，仍然很少，特別是對軍閥戰爭失敗主義的工作，執行得非常不充分。

五、組織上的右傾觀念，尤其嚴重；特別是將組織工作認為技術工作的機會主義的觀念，在黨內障礙着組織的健強。發展組織的保守與狹隘的觀念，更形成右傾的基礎。

所以，全國五一運動中組織的發展，異常薄弱。

以上的現象，證明目前黨內最危險的仍然是右傾。現在當紅色五月終結之後，革命形勢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堅決的作反右傾的鬥爭，深入反右傾鬥爭到支部中去，才能執行黨的路線，才能領導羣衆的政治鬥爭，推進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爭取蘇維埃中國的勝利。

一九三〇，六，二二。

蘇聯集體農業運動近况

楊新松

改造農村

使農業機器化，使農民集體化，使農村與城市的區別漸漸的消滅，使農業經濟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中之一個。

農村機器化的問題在蘇聯五年計劃內差不多已經完全解決了的，無數的製造耕種機及各種農業機器的工廠已在建築，其中有好幾個到現在已建築成就了，許許多多的耕種機及各種農業機器已在向鄉村運送。在最初計劃五年計劃時的計算到一九三三年在蘇聯每年能生產五萬三千個耕種機和總共能有二十二萬個耕種機，可是據最近的計劃到那時在蘇聯每年能生產二十萬以上的耕種機和總共能有由八十萬到一百萬個耕種機。無疑義的在最近的將來耕種機定能佈滿蘇聯遼遠的和僻靜的農村，無疑義的在最近四五年以後，蘇聯能成爲一個在世界上第一個出產農業機器的國家。

改造農村，使農業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祇靠機器化是不能夠的。除此以外還必須使散漫的農民團結起來去使用必需共同勞動的機器，在他們共同勞動之下漸漸的以消滅農民的很深厚的私有觀念，催促他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很明顯的，使用偉大的機器去耕種田地必需要有許多農民共同的勞動，散漫的，零星的，個獨的農業如果不

把他們集合起來是絕對沒有方法去使用偉大的機器和最新的技術。同時，如果沒有農民集體的共同的勞動是絕對沒有可能去消滅他們的私有觀念。我們知道，取消私有觀念，消滅私有制度，共同勞動，共同分配是建設社會主義必需的條件。那麼，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除農業大工業化以外當然還要使農民團結起來共同的勞動，使農業集體化、發展集體農業運動。

什麼是「集體農業」？

集體農業就是在鄉村裏農民共同勞動的合夥的各種組織，這種的組織在現在的蘇聯總共有三種——同勞社，勞動社，和公社。這三種的組織有一個總的共同點，就是加入該社以後，每個農戶從前向國家所領取到的耕種田地的界限完全取消，每個社員過去所耕種的田地都歸該社公共的使用，其次耕種田地都是站在共同勞動的原則上的，沒有什麼某一塊田應該你去耕種，某一塊田應該我去耕種。他們互相間分別的地方就是：同勞社和勞動社同前一二年在中國醴陵農民暴動勝利後農民所組織的「共耕分吃」相類似的，就是勞動的時候是各社會共同的合作，勞動的結果按照每個社員工作的能力，按照每戶工作人員之多少而分配之。生活每戶各個獨立的，總之，就是共同勞動分立生活。這就是同勞社和勞動社的總的現象，他們的中間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同勞社田地雖大家共同耕種而生產工具（牛，馬，及耕田地的一切家伙）還是每個社員各自的私

有，如果該社要使用某家某種生產工具，或牛，馬的時候應有相當的報酬，因此在同勞社內還免不了間接的互相剝削勞動的現象。在勞動社內互相間接剝削的現象就沒有了，在那裡主要的生產工具都為該社所公有，在那裡沒有什麼那一隻耕牛是你的，那一匹馬是我的，但是居住的房屋，自吃的菜園，奶牛，家禽，家畜等還準許各自私有。無論如何勞動社是要比同勞社進一步的；公社是集體農業中最高形式的組織，在那裡不但共同勞動，而同時共同的分配。這個組織是與過去中國醜陵農民的一共耕分吃一相彷彿的，在那裏一切財產，無論是雞，豬，牛，馬，房屋，園田及一切器具是都歸公社所公有的，在那裡吃飯共同的，一切的消耗，如穿衣服及各種日用品是不按照勞動能力而按照每人所需要而平均的分配之。總之，公社是已取消私有制度的，共同勞動共同分配的組織，是將來社會主義社會的小小的雛形。

集體農業運動

在蘇聯突飛猛進的發展是過去誰也沒有料想到的，在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五年內將全國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戶組成爲集體農莊，可是在今年二月間已有百分之五十集體化的農戶了。這樣偉大的勝利是對於整個的工人階級，對於他們的領導者——蘇聯共產黨，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有絕大的意義。這樣偉大的勝利完全證明蘇聯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政策之正確，是完全證明工人階級能領導農民去改造他們的社會經濟的基礎，

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目前蘇聯共產黨的責任就是：「鞏固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的應用牠，以備將來向前進行」（斯大林）。

集體農業運動在這種風驟雲湧的勝利中間，使得各地黨的蘇維埃的，及一切集體農業運動中許多領導工作的同志弄得頭暈顛倒，集體農業這樣迅速的發展，他們以為自己的力量不知有多少大，他們認為「我們什麼都能幹」，「一切都是小事」，「在世界上沒有難事的」，他們輕看了集體農業運動工作之複雜和困難，他們認為組織集體農莊用不着什麼預先準備，用不着去顧到各處地方情形之不同，祇要下一個「命令」就夠了，用不着經過什麼集體農莊的過渡到公社的形式——同勞社和勞動社，一開始就組織公社多麼簡單呢，因他們犯了這些錯誤使得黨在農民中間失掉不少的威信，集體農業運動受了不少的損失。

各地作領導工作的人員主要的錯誤

一，違犯列寧主義的組織集體農莊自由的原則。根據列寧的遺言，祇有站在自由的原則上才能組織集體農莊。組織散漫的農民到共同耕種的道路是不應有任何的強迫手段，無論任何強迫的手段是沒有可能把他們組織起來的，祇有在實際上將集體農業對於農民的利益表顯給他們看，在散漫的，零星的農村經濟的面前，樹立模範的集體農莊，使得周圍的農民感覺必須組織自己，使他們自願的來組織集體農莊，到那時集體農業

運動的勝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不然，集體農業運動就要失敗。

可是有許多各地參加實際工作的同志，將這樣最淺近的組織集體運動的列甫主義的自由原則完全忘記了。有許多地方他們曾經預先什麼也不準備，很倉促的用強壓的手段硬拉農民組織集體農莊，有些地方因農民不服從他們的「命令」，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時候，他們就紙面上空口的宣佈當地全區集體農業化，把那些不服從他們的農民（尤其是中農）當作富農看待，將他們的財產一切沒收，把他們驅逐出境。這樣一來使得一部分農民開始仇視集體農業運動，開始懷疑黨對於他們的政策，幾乎使集體農業已得的勝利動搖起來。

二、他們忘記了集體農業運動在各種不同情形的區域內應採取各種不同的步驟和方法。他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各種經濟條件和農民文化程度高低的區域之存在。他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幾乎完全自然經濟的，已商品化的，已工業化的各種不同的農業區域之存在，而把牠們都當作同類的看待，而都大聲疾呼的：「全區集體農業化！」！「全區集體農業化！」……。

在今年一月聯共中央關於集體農業化的議決案上說得很明顯的，在那裡將全蘇聯劃分為三大區：第一是蘇聯主要的穀麥區域，北高加索，中鵝兒克江區，和下鵝兒克江區，集體農業運動在一九三一年春季告結束；第二，其他的穀麥區域（烏克蘭，中央黑地

州，亞伯利亞，烏拉領等等）集體農業運動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告結束；第三，其他的區域集體農業化可以延長到一九三三年。

可是在實際怎樣呢？例如莫斯科特別區完結集體農業化雖然還有三年的期限（到一九三三年），可是當地的同志開始就想在今年的春季把他結束，中央黑地州結束集體農業化雖然還有兩年的期限，可是他不想「落伍於別處」亦準備在今春完結。而其他更落後的區域也公然的思想「追上和超過」前進的區域。這樣一來，很明顯的，對於集體農業化還沒有相當準備的，還沒有相當條件的區域想「追上和超過」比較有準備的，有條件的區域，當然必須要採取強壓的手段，硬拉農民加入集體農莊。這種強壓的結果，很明顯的不但不能使集體農業運動向進一步，而反要使他向前後退步。

三，破壞集體農業運動現時的主要形式，違犯了列甫主義的領導羣衆運動的原則。斯達林同志在他的「因勝利而頭暈」的文章上說過：「人爲的領導是很嚴重的事情，不可落伍於運動，因為落伍就是脫離羣衆。但亦不可跳到前面，因為這是失掉羣衆的聯繫。誰要領導運動和保存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他就應該在兩條戰線上奮鬥——反對落伍者和反對前跳者」。這裡的意思就是說凡是領導羣衆運動者，尤其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員在領導各種運動的實際工作上首先應嚴格的估計運動的現狀及其變移，根據實際情形，顧及羣衆的需要和情緒，下一一定的原則，採取相當的策略

，不要脫離羣衆，推動羣衆運動向前進展。

蘇聯根本的改造農業開始才不久，農業機器化雖然已在迅速的發展，但論其整個的情形其實還很幼稚，廣大的集體農業運動開始不到一年的光景，牠還在中途，還沒有鞏固，大多數農民（尤其是中農）對於集體農業還沒有十分的認識清楚，一般農民私有財產的心理還非常濃厚，因此，聯共中央在今年一月關於集體農業運動的決議案上認為農村的勞動社最適合於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這是很明顯的，同勞社不能適合於已在中途的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因為牠是私有制度很濃厚的共同勞動的組織，是集體農業運動最初期的組織，是已經過去的組織。同時農村公社亦不適合於現時的集體農業運動，因為牠是幾乎完全取消私有制度的組織，是最高形式的組織，是結束整個的集體農業運動的最後組織形式。如果我們認為同勞社是現時集體農業運動的主要形式，那麼，我們就落伍了運動，脫離了羣衆，如果我們認為公社是主要的形式，那麼，我們就跳在集體農業運動的前面了，失掉了與羣衆的聯繫，因此，……要領導運動和保存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繫——勞動社是最適合現時集體農業運動的組織，因為牠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公有的，私有制度比較淺薄的，共同勞動社的組織是集體農業運動中途的組織，是由初期組織過渡到最高形式組織的組織。

可是各地領導集體農業運動的同志，被初步勝利所醉迷了將領導羣衆運動的列寧主

義的原則，將聯共中央的決議案完全忘記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上拋棄了集體農業現時的
主要形式——勞動社，而「命令」將初初加入集體農莊的，私有財產的心理很濃厚的農
民，都硬迫他們組織最高形式的公社，用強迫的手段將他們家畜，自吃的奶牛，居住的農
房屋，自吃的菜園等，都歸社有。這樣一來，將小胆的農民（尤其是中農）嚇壞了。
結果，當然阻礙了集體農業順遂的發展。

這些是集體農業運動上主要錯誤。但這些錯誤對於工人階級有什麼危險呢？很
明顯，如果讓這些錯誤自然的繼續下去，結果必然破壞集體農業運動，使工人階級失掉
鄉村裏的主要的同盟軍——中農，使貧農在農村失掉作用，減弱社會主義建設全部的力
量，傾向恢復富農。總之，這些錯誤能將工人階級由與主要農民羣衆鞏固聯盟的，領
導農民改造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由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推到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
失掉農民羣衆的道路。

向破壞黨的路線奮鬥

當然，在斯達林同志領導下的列寧的聯共中央所管轄下的蘇聯境內這種無原則的，
無聊的，不負責任的事情不能讓牠自然的繼續下去。在上述這種現象發現不久，聯共
中央就見到了，當時就委托斯達林同志作一篇警告違犯黨的路線的人們的文章——「因
勝利而頭暈」登載全國各報，同時聯共中央在三月十五日的決議案上宣佈堅決的向破壞

黨的路線者奮鬥。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案上大概就是說：絕對禁止在集體農業運動中用強制的方法，同時在自由的原則上極力的吸收農民羣衆加入集體農莊，鞏固現有的集體農莊，鞏固集體農業運動已得的勝利，在集體農業運動還未成熟的地方和沒有上級機關的許可，絕對禁止直接的組織農村公社和即刻停止強迫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將他們的居住房屋，家禽，家畜，非商品的奶牛歸社公有，嚴格審查已被取消的富農的名單和即刻改過對於中農已犯的錯誤……等。這個決議案不是空洞的，而是很切實的，在該決議案最後一條說：「沒有能力的或不願意向破壞黨的路線作堅決的鬥爭的工作人員撤退職務，以別人代替之」。

在斯達林的文章和聯共中央的決議發表以後，各地黨的組織都重新審查自己在集體農業運動上執行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大多數地方黨的組織都承認自己的錯誤，即刻改正自己的錯誤，極力的在農民羣衆宣傳真正的黨的路線。祇有少數同志如過去在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譚平山等式的人們自己犯了錯誤而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於這樣的人們布爾塞維克的黨當然不客氣的要堅決的向他們奮鬥，撤退他們的職務，處罰他們，甚至於開除他們出黨。

犯了錯誤，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不願意改過自己的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本來，錯誤在鬥爭中是不能免的事，承認自己的錯誤並非是羞辱的事在布爾塞維克的觀

點下而是很英勇的事。犯了錯誤，承認這個錯誤，即刻改過錯誤，在錯誤中學習，免去將來的錯誤，在錯誤中找到正確的道路，更踴躍的前進奮鬥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戰鬥員。

現在的情形。在斯達林「因勝利而頭暈」的文章和聯共中央向違犯黨的路線奮鬥的決議發表以後，已被取消的富農分子和在富農影響下的反動勢力的殘餘，用「自由」的口號去宣傳中農，使他們來反對集體農業運動，反對在農村中無產階級的領導，結果有許多已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尤其是從前被硬拉進來的中農）大批的退出集體農莊，恢復他們的個獨的農場。可是大多數的貧農，一部分覺悟的中農都沒有動搖，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都很踴躍的，在集體農場內極力的擴充耕種田畝，提高和鞏固集體農莊的經濟，對外堅決的向富農的殘餘及農村間一切反動勢力（天主教堂，教士等）作堅決奮鬥，同時猛烈的同無組織的農民，已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宣傳真正的黨的路線，宣傳集體農莊對於他們的利益和在春耕時期在事實上證明給他們看。在最近一二月間各地黨的組織在鄉村裏極力向農羣衆宣傳真正的黨對於集體農業運動的政策，同樣的在城市向工人羣衆宣傳，另一方面聯共中央在四月二日命令蘇聯的政府定出優待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的決議案，在兩年期內完全免去在集體農莊內，牛，馬及一切牲畜的捐稅，無條件的取消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在未加入前他們所欠國家的農業捐，各種的處罰……等等

。所以這樣的結果，大部分的農民關於黨對於他的政策，集體農莊對於他們的利益漸漸的都了解起來了，不久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都懊悔自己過去的錯誤了，大批的都請求重新加入集體農莊。不但這樣，在這些農民中間有許多並且請求加入共產黨。這種現象就是證明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政策之正確，證明蘇聯共產黨在集體農業運動中所採取的政策之正確，證明聯共中央能夠領導黨的羣衆，整個的工人階級去引導農民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結論

蘇聯的農村已走上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農村機器化是這個改造的技術的基礎，集體農業化已成了這個改造的槓杆了。在集體農業運動中各地雖然犯了許多的錯誤，幾乎動搖了集體農業運動，但因聯共中央善於領導，很快消滅了這些錯誤，鞏固了已得的勝利，重新的又開始了領導集體農業運動向前進行。

莫斯科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日

蘇聯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代

之華

一 偉大的轉變

中國工友們！ 你們的祖國——蘇聯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十月這一年是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偉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就是社會主義向城市及農村資本主義成分舉行極堅決的進攻。在這一進攻的階段中的成績可分爲三方面：

(一)就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在這方面達到了可以決定一切的轉變。這一轉變的表現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興奮性的發展。所以能發展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興奮性的緣因在於這樣的方法：

A 是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和壓制羣衆勞動自動性與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作鬥爭。

B 用社會主義競賽方法來和偷懶者及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破壞者作鬥爭。

C 用進行不斷生產制的方法來和舊習慣和生產中的守舊派作鬥爭。

有了以上的三種方法在勞動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成績，這種成績的意義很大，因爲只有成千成萬的羣衆的勞動的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向前發展。

(二)就是工業建設方面，在這一年內蘇聯在基本上已經把大規模建設重工業的基

金積累問題解決了。在生產工具的生產中已採取了很快的速度，並造成了一種先決的條件，把蘇聯的國家變成了五金業的國家。工友們，你們看看蘇聯雖然在世界帝國主義包圍之中，但是在經濟上一天一天地進步，這些進步他們完全靠自己——工農兵的力量，勝利地解決了重工業的基金問題，關於這些事實就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也不能否認了。實際上：一九二八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共有十六萬萬多盧布，其中有三十四萬萬多盧布是投入在重工業內面的，而一九二九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則有三十四萬萬多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面的；一九二八年大工業生產品總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的生產品是增加百分之三十，而一九二九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則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的生產品總數又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這種工業發展的速度是使全世界資產階級都害怕起來了。蘇聯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也奇怪起來了，布哈林所害怕的五年經濟計劃的最高標準，實際上已變成五年經濟計劃的最低標準了。

(三) 農村經濟建設方面的成績，就是蘇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小的落後的個人的經濟，轉變為大的先進的集體的經濟，轉變為共同耕種，轉變為機器的耕種機站，轉變為建築在新技术基礎上的合作社和集體農莊，轉變為巨大的為百數的耕種和收穫機所武裝起來的蘇維埃農莊。農村經濟建設的發展有了偉大的意義，就是在許多區域

內，已經把農民的基本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道路只對於少數的富裕資產階級有益，而使極大多數的農民陷於貧困）轉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只有這個道路才能達到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成份，而將中農和貧農重新武裝起來，就是用耕種機和其他的農村機器，將中農和貧農武裝起來，使他們脫離貧困和富農的剝削，而走上廣大的協作的集體耕種的道路。工友們！你們看了以下的幾個數目字就能夠明白蘇聯在農村經濟方面的成功。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畝，其五穀商品量，共六百多萬担（約三千六百五十萬普特），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三十九萬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三百五十萬担，（約二千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共一百八十一萬六千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八百萬担，（約四千七百萬普特）；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共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畝，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一千三百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至於在一九三〇年，則照他們的標準計劃，蘇維埃農莊的耕種面積就應達到三百二十八萬畝，其五穀商品量，却要達到一千八百萬担（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的耕種面積，則要達到一千五百萬畝，其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千九百萬担，（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就是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萬萬普特以上，就是說，要達到整個農村經濟五穀商品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指在農村以外的五穀流通數量而言）。

集體農莊建設方面這種空前的進步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主要的。

第一是因爲蘇聯共產黨實行了列寧主義的教育羣衆的政策，和能夠有系統的用合作化意義的方法，來引導農民羣衆走到集體的經濟。就是說黨對一切傾向進行了一種勝利的鬥爭：一方面和那種超過運動與企圖破壞集體農莊之發展的傾向（「左派」的詞句）的半托洛斯基派作鬥爭，別方面和那種企圖把黨拉往後去甘作運動的尾巴的傾向（布哈林一派）作鬥爭並且戰勝了這種左的右的鬥爭。

第二因爲蘇維埃政權能夠正確地計量到農民羣衆的需要，計量到農民對於新農具的需要而加以實際上的幫助，如設立農具租借處，耕種機隊，農業機器站，如進行共同耕種，設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的力量來從各方面幫助農民經濟等等。從此農民就脫離舊的耕種而走上了集體經濟的運動的道路。

第三因爲蘇聯國內的先進工人能把這種事業，抓到自己的手裡，能實行領導基本的農民羣衆使他們相信並努力集體經濟的運動。

蘇聯在經濟方面的發展已如上述，根據這種實際狀況，就已經把資產階級國家的一科學一家的預言——反對五萬畝和十萬畝的巨大的五穀工廠，以爲這是不可能而且不適宜的等等——完全破產了，尤其把黨內的右派機會主義者的斷言打得粉碎——他們認爲（一）農民是不會到集體農莊內來的，（二）加緊集體農莊發展的速度，只足以引起羣

衆的不滿意，引起農民和工人階級的聯盟的破裂，（三）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的大道，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四）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中資本主義成分就會把蘇聯國家變成沒有麵包的國家。事實上恰恰相反，農民羣衆帶着整個的鄉村，鎮，區，跑進集體農莊來了，在新的生產上的基礎中加強了工農羣衆的聯盟，所謂鄉村社會主義的「大道」自然是初步的合作形式，即供給和消費的合作社；可是當高度的合作形式就是集體農莊形式，所以集體農莊形式就成了鄉村發展的大道了。右派份子忘記了時候性，看不見社會主義的改造在那裡進步的。蘇聯正因為有了集體農莊運動的發展向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攻才能在目前穀類收穫事業上有這種巨大的成績在國家手裏聚積了幾千萬普特的穀類儲蓄，使國家跑出了麵包的危機。

工友們！蘇聯的經濟建設的進步就是可以保障工人的利益，尤其對於與蘇聯最接近的中國工人直接地能夠得到革命運動幫助，直到完成革命以後的經濟建設。所以我們聽了這些消息以後應該高舉我們的紅旗來慶祝蘇聯的勝利！

二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策略問題

（一）

列寧在自己寫的一篇文章上（在無產階級獨裁時代的政治經濟）這樣說「無產階級獨裁時代，俄國的經濟是共產主義所結合的統一的偉大國家，與小商品生產，保存着的

資本主義，以及在他的基礎之上復活起來的資本主義初步的鬥爭」。

列寧常常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說法，什麼小資產階級的小商品生產好像與社會主義生產的形式是一樣的，又如布哈林，認為小生產可以生長到社會主義而且因此就說富農可以生長到社會主義。列寧主義恰恰相反，他認為小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它不能夠生長到社會主義而且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中改造經濟的時候要與小商品經濟作鬥爭的。

無產階級是否能夠用強力去強迫小農走到大的社會經濟的原則上呢？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政策是否也能用強力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在列寧的一篇「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文章上這樣地寫着：

「社會主義是消滅階級的，爲要消滅階級首先要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這個任務我們已經執行了，但是這不過是一部分的任務，並且不是最難的，爲的要消滅階級，應該有第二步，就是要消滅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分別，使他們都變爲工人，但是這不能立刻做到的，這個任務比較的更要難些更要長久些。這個任務不能以推翻任何階級來解決的。只有組織和改造一切社會的經濟，就是從單個的特別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大的社會經濟，才能夠來解決的」。

因此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對於中農的關係是建築在集體經濟的道路之上的，使農民

自己明白不能夠再過舊的生活，只有過渡到集體經濟的形式才是他們的出路。

(二)黨的經濟政策的轉變及其轉變的前提

爲什麼在現在時候可以提出消滅富農階級了呢？應該在些什麼條件之下消滅富農階級呢？

第一消滅富農階級與鄉村小商品生產制度的存在有密切關係，在鄉村中還是小商品生產制度的時候就不能夠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列甯曾經說過「小商品生產在羣衆範圍之內不斷地每日每時的自然的生產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第二消滅富農階級與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不可以分離的。廣大的中農羣衆甚至貧農羣衆還沒有在自己的經驗中信任大的集體農場的優點的時候，富農在經濟問題上還有很大的威信的時候，農民羣衆還沒有能夠很明白認識未來的大的集體農場的利益的時候，廣大的農民羣衆還沒有團結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時候，那就不能直接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

我們應該要明白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的改造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斯大林同志說「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去堅決的進攻富農，消滅富農的反抗以致消滅富農階級，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現在貧農和中農羣衆自己起來沒收富農的財產實行團結到集體農場中來，現在在鄉村中整個集體農場的沒收富農財產已經不是一

個簡單的行政辦法。現在沒收富農財產是發展集體農場的組織部分了」。

從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成份轉變到整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這是黨在解決問題上的主要策略之一。

右派機會主義者不瞭解一切問題的時候性和實際環境的變動，他們常常喜歡把過時的策略應用到現在來，對於富農問題他們認為我們已經戰勝了富農不成問題了，現在只要來完成這個勝利好了，反對進攻和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他們的目的完全要避免階級鬥爭，避免堅決地打擊富農這是亡黨的政策，這是蘇聯黨內主要的危險。同時黨還反對另一種左的過分的傾向，就是趕過羣衆運動，而且把中農也當作富農一樣來「消滅」，用強迫的手段對付中農，這種傾向可以破壞集體農場運動的進行的。

三 消滅富農階級和國家經濟的突變

黨對於富農的政策是根據於整個國家經濟變動而決定的。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漸漸地把市場式的關係去掉，而代之以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分配方法。

蘇聯的經濟組織完全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聯國家的政權在無產階級手裡，一切生產機關就在無產階級管理之下，他們有生產合作，消費合作社等等的組織，在鄉村的經濟組織是這樣的，就是每個鄉村中都有勞動社的組織在幾個鄉村之上就有總的聯合會。各勞動社在生產和消費兩方面要與總聯合會締訂條約，在這條約上就規定着，勞動

社的任務是把有組織的有計劃的鄉村經濟生產品和多餘下來的生產品供給國家和總聯合會，同樣，國家和總的聯合會的任務要供給勞動社所須要的生產工具和消費品等等，這裡我們就可以看見在蘇聯已經有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的成份。

現在蘇聯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就是應該要來造成功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經濟基礎。列甯教訓我們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是容許有資本主義存在的，我們要限制它一定的發展，同時到了一定的時候必須要跳到它的前面就是說從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競爭的階級轉變利用社會主義的力量來消滅資本主義的成份。現在蘇聯的客觀環境已經證實了新經濟政策到了第二個時期，就是要堅決地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的時期了。

• 列甯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新經濟政策完全可以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的」。

只有盲目的人才會重復了托洛斯基和齊諾維夫等反對派的觀點認為新經濟政策是有系統的退守政策，認為史太林的發展生產力的方針是引導到降低社會主義成份的比重，實際上他們表露了自己的叛徒行為不信任在蘇聯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右派機會主義者也與這些人一樣在這些問題上是失敗了，他們忘記了在社會主義生產力強大和階級力量相互變換的時候新經濟政策的形式和內容應該變更，他們竟停住在新經濟政策的第一時期，不懂得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的速度和集體化的成績，在生產

關係上建立了工農聯合的基礎，鞏固了城市工人領導中農貧農羣衆的力量來改造鄉村經濟的生產制度造成消滅階級的條件。他們恰恰相反認爲進攻富農和消滅富農階級是破壞工農聯盟的政策，可是事實已經證明他們錯了，進攻和消滅富農的政策是列寧主義的路線黨執行了列寧主義路線所以在改造社會主義的實際上得了偉大的勝利。

新經濟政策的第一個時期是工農聯合的消費形式，第二個時期是工農聯合的生產形式，就是因爲農民不但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不但城市工業化，而且鄉村也要工業化消滅工農之間的分別，大家共同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誰來反對工農聯合的生產形式，誰認爲全部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給小生產者的商業自由，誰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路線。

斯太林對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這樣說的，「新經濟政策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特別政策，是爲有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國家領導之下的資本主義存在而準備的，爲資本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成份的鬥爭而準備的，爲社會主義成份作用的生長，資本主義成份損失下去而準備的，爲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而準備的，爲要建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消滅階級而準備的。誰不懂這新經濟政策的雙重性，誰就離開了列寧主義的路線。」

他又說「應該要揭穿這樣的錯誤，有些人認爲新經濟政策只爲了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不錯，我們是需要城市和鄉村間的聯系的，但是我們不是需要隨便什麼的城市和鄉

村的聯系，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工農聯繫。我們要保存新經濟政策就因為新經濟政策為社會主義而服務，如果當它不能為社會主義而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放棄它，列甫說，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嚴重的，長久的，但是他從沒有說過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永遠的。」

從此，我們知道了蘇聯黨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在目前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上所必須的政策，蘇聯的共產黨雖在絕困難的環境中，但是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之中得了極偉大的成績，現在不但在城市有很大很好的機器，就是在鄉村中也有了許多機器，耕田是用機器了，所以農民都集中到有機器耕田的集體農場去了。他們也與城市工人差不多了，他們的生活都比任何國家的工人和農民要好，他們每天只做七小時工作，有的只有五小時，他們做四天工可以休息一天，他們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工人的生活。

三

四川革命形勢的開展及其發展的前途

寬陽

一 一切危機矛盾的到來

四川天字第一號的軍閥劉湘曾在年底說「三月內勿論如何統一四川」，事實把他這一誇大的囑語投到馬桶內去了。

劉湘軍閥不能統一四川，也如蔣介石或任何一個軍閥不能統一中國一樣。

自然劉湘軍閥相當的代表着重慶的商業資產階級和自井的鹽業資本家，幻想着用自己優越的經濟基礎和南京蔣介石政府的政治背景，把四川形式地——至少是使各派軍閥就他的範圍——統一起來，使他所代表的重慶大商人和自井井灶主能得着相當的發展，因此他一面極力完成成渝馬路的計劃，一面與廿四軍劉文輝公布了「整理鹽業的條例」。

可是，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所爆發的南北軍閥混戰，反映到四川的各派軍閥也極力準備着猛烈的廝殺。同時，各派軍閥爲要把握勝利的前途，必須等待全國軍閥混戰有了一個決定勝負的象徵，然後才作總的爆發。事實上全國軍閥的混戰，在帝國主義竭力幫助和推動之下，絕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所能解決，而形成起伏的長時期的紛亂。四川受着這樣外感症的傳染，也同樣在一個大的醞釀過程中，隨時要爆發一些局部的戰爭。所謂「遼寧會議」，「成都會議」，「瀘州會議」，「營山會議」，「順慶會議」……等等，都

是這一矛盾之具體的說明。

最近特別是川東的戰爭走到了爆發之焦點：一個動力是劉湘爲完成其統一四川迷夢之第一步統一下東的計劃，解決橫互渝萬之間的陳蘭亭部隊。一個動力是劉湘要拉攏楊子惠停止其覬覦重慶而投入二層將領的聯盟中。爲要實現這一政策，只有助楊子惠進攻劉存厚，取得綏屬數縣的防地以安插其二萬餘無飯喫的部隊。

劉湘真能統一四川麼？只要不是客觀上幫助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取消派，他絕不能作一個肯定的答覆。主要的原因，是四川比其他各省所帶的半自然經濟更濃厚，更沒有一個統一全省的地方市場，也就更容易反映全國以帝國主義爲背景的軍閥混戰，這一反映更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在這一形勢之下，無疑的要加重人民的負擔，除了負擔幾個大的軍閥之統籌的軍費政費而外，又必須增負各小軍閥——二層將領——在自己防區內之苛捐雜稅之剝削。

劉湘雖然他企圖很快的完成成渝馬路，雖然很願意自井的鹽業恢復起來，可是，爲了戰爭的需要，不能不拉用并勒征馬路款以購置飛機。不僅自動的取消了「鹽業整理條例」，（裡面有「不征附加」之規定）而且宣布了「每担鹽劬，於正稅項下，加繳五角」之明令。這是充分的證明了民族資本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中國之下，是不能突破這一危機走上統一市場的道路。我們可以結論到「四川只有長期的軍閥混戰，沒有統一於任何一

個軍閥的可能」。

軍閥混戰之準備和趨勢，是這樣顯明而險惡：劉湘從德國購回了十餘架飛機（已到重慶戰鬥機六架）千餘架機關槍，二千餘手槍及最新式的步槍。同時在重慶趕造拍擊炮，快中快、擲彈槍，以及各種步槍子彈。劉文輝與田頌堯在成都拚命的搶奪兵工廠，爆發了一月十四成都南門外的巷戰。鄧錫侯也加緊的製造槍彈，各小軍閥如羅澤洲也在順慶兵工廠趕造新式械彈，特別是每個大軍閥都祕密的趕造毒瓦斯以及炸彈。劉湘在重慶，梁山兩處建築了飛機場，成都鄧，田，劉的部隊隨時互相警戒，楊子惠在渠縣一帶佈防，劉存厚準備向梁山方面禦戰……這許多的事實擺在全川人民的面前，爆發後的戰爭，必然運動全川人民的生活。

現在四川的人民的痛苦已經是到了嚴重的時期，譬如劉湘在下東各縣籌公債二百萬元（重慶市民擔負八十萬，各縣擔負一百二十萬）他下面的小領袖又加籌月捐（如忠州每月二十一萬元）以及各種苛雜附加。鄧錫侯在自己防區內共籌公債四百萬元，以二百萬擔負在成都市民身上，田頌堯在瀘川各縣的剝削也不下於其他軍閥。因此，促成了四川各種的危機到來。

第一我們看見的是鹽業經濟的衰落，行商受苛捐雜稅的影響，不願購運鹽觔，政府曾強迫要行商購買五百載，而行商則消極的逃跑，又因為封建地域的束縛之下，包商包

銷，分引分岸種種限制，使鹽業銷場，一天天更加縮小，形成「產浮於銷」的現象，井灶主不得不採取縮減生產，可憐的實行生產合理化。以致如大坡堡從去年三十六口井，現在減至十六口井，并且經常起推的只有八口井。又因為鹽業的衰落，影響到附近各縣工業和農業的破產，譬如榮威的煤礦工業和富順各種與鹽業有關之手工業以及運輸工業都跟着蕭條或破產，鹽業為四川主要經濟之一，牠當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一般人民生活的惡化。

第二是商業危機的加緊。如重慶一月至四月，倒閉的較大商號，竟達廿家左右。列表如下：

倒閉商號

- 鴻信
- 李白先
- 嘉祥
- 安記
- 裕成通
- 謙和
- 賈林

倒閉銀數（以兩為單位）

- 三〇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〇
- 二二〇〇〇〇
- 一七〇〇〇〇
- 四二〇〇〇〇
- 一六〇〇〇〇
- 五〇〇〇〇

協通 華環 致和 蜀興 西記 宏裕 川江 陳禹門 永聚元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共計倒閉二三六〇〇〇〇兩（四月廿六號大中華報）

這表只列入了三萬兩以上的，至於三萬兩以下的不知有多少。一二萬兩和七八千兩的倒閉，至少也有百家左右。劉湘劉文輝，看見川南的鹽業和川東的商業，有這樣逐漸破產和倒閉的現象，申匯暴漲，物價一般的貴到幾乎一倍。不僅影響到社會的金融，城市貧民將因此而引起極大的騷動，特別組織了一個「川東南商業整理委員會」。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至多只能使幾個大商人和鹽灶主借此以控制各個小商人，毫無實際的意義。譬如，夏布業之倒閉，苛捐雜稅實促牠實現的主要動力。從榮昌到

重慶，爲程僅三百里，而所納之捐稅，除正稅外，苛捐雜稅竟達十五次之多，其他各貨運輸也同樣平均在廿里路內有一個關卡。茲將由榮昌到重慶每件本值卅七元之夏布除正稅不計外應納之苛捐列下：

捐稅名稱

邛亭舖護商印花稅

津永瀘護商捐

津永瀘團費

大安場印花稅

馬坊橋山防捐

小馬坊橋山防捐

來鳳驛護商印花捐

渝北護商印花捐

渝北江防捐

渝北分收捐

渝北印花捐

重慶統捐

應納數目

○·九角

二·七五角

○·七五角

一·角

一·角

二·四角

○·八角

一·二五角

一·二五角

○·八一二五角

一·角

三·角

重慶統捐附加

重慶護商捐

重慶商團捐

一·二角

○·七二五角

○·二四角

共一·九元強

除了這些苛捐雜稅而外，還有什麼卡員驗丁的手續費，茶酒費……合併正稅，其稅率達百分之八九。在這種層層捐稅之下，任使用什麼整理委員會也「整理」不好的。川西，川北無論任何一個城市的商業，都沒有方法可以使牠活躍起來！

第三是一般工業的破產特別是手工業的破產。譬如重慶的絲廠除了日本資本的而外，其餘中國資本的五六家今年幾乎都不能開門，直到最近才勉強的開工。瀘川，嘉定，順慶，各地的絲廠，都不斷的減少。資內的糖業生產，榮威的煤礦工業，都帶着每况愈下的趨勢。至於手工業如重慶的鐵木機械布工業，由三千餘架機頭減少到一千餘架。成都的機械工人由一萬餘人減少到四五千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看得見手工業的破產非常迅速。

第四交通工業也同樣的衰落，譬如來往直渝的輪船由三十餘艘減少到十餘艘。並且這些四分之三是日清，怡和、太古的輪船。行走上游的小火輪，也由卅餘隻減少到十七隻。這一面證明交通工業之衰落，一面更證明民族商業的衰落。自然，在相反

一方面，帝國主義商品的進攻，更加厲害。軍火的輸入也以這時期為最多。美帝國主義更籌劃辦一宏大的桐油公司，壟斷全川桐油市場。

第五是農業的恐慌。去年的秋收天旱和小春的沒有收成，各地軍閥勒種鴉片煙，各種錢糧預征，團費，馬路捐，過道捐……使農民大批的離開農村。荒廢土地，成千累萬的農民流為土匪或神兵，大批的農民形成「吃大戶」的騷擾。

總而言之，四川絕不能如一般和平主義的夢幻者或國民黨政客所歌誦的——天下太平了！

二 羣衆鬥爭之開展

四川決不是獨立的王國，不是中國整個政治經濟的劃外，在全中國鬥爭的形勢已經走到直接革命的前途，巨大的浪潮不會湧進夔門以內去。更不能說帝國主義特別恩惠四川不加緊對四川的商品進攻和製造軍閥的混戰。如果我們沒有理由否認上述的事實，我們決不能用「四川經濟落後」「民衆文化水平低落」這一類辭句來抹煞羣衆鬥爭之復興的形勢。

自然，我們也不能過分的非馬克斯主義地說，四川馬上就有一個全省蘇維埃的成功。但是工農兵士貧民，在生活日益惡化之條件下面，消蝕了許多畏縱的情緒。的確，他們從一切危機之到來這一真實的革命基礎上，開闢了偉大的鬥爭的坦途。

我們且舉幾個主要鬥爭的事實來說一般的狀況：

一、自井鹽業工人的大罷工

自井鹽業工人，從去年兩次總罷工失敗後，他們更加認識了資本家殘惡的面孔，積極準備着第三次總罷工的行動。年關時候，在赤色工會領導之下，發動四五千人的經濟鬥爭，得到了相當的勝利。今年井灶廠主，盡量的改變生產合理化的組織，減少工人，壓低生產，加重工作時間，使一般工人感受失業的恐慌和生活的痛苦，失業鬥爭和經濟鬥爭匯合而成了這次大罷工的偉大行動。

三月十六日，郭家坳全體車水工人宣佈了同盟罷工。同時，大坎堡的失業工人也舉行了壯嚴的示威遊行表示援助。遊行的路線經過來龍壩到工人區域解散，沿途高呼：援助郭家坳工人罷工，要工做，要飯吃……等口號。十九日資本家勾結駐軍武裝鎮壓，廣大的羣衆用堅實的團結，竟能衝破了這一武裝的鎮壓繼續罷工的前途。資本家更殘酷的一面斷絕工人伙食，一面拘捕工人，宣佈如不復工者，處以槍斃。於每廠門前按置軍隊和圍隊不許工人出外，工人仍積極的組織大坎堡在業工人的同情罷工。二十一日大坎堡全體罷工實現了，長土工人也非常表同情，漸漸的推動這一罷工瀾漫到整個井區。資本家非常恐慌，僱用黑老表（即附郊失業的農民或苦力，沒有做過鹽業工人的）來車水，威嚇工人，工人竟衝擊了駐軍和圍隊的防守到觀音灘驅走黑老表，拖回

水車表現了非常勇敢的行動。廿三日資本家派請副官到竹子三講演，勸工人復工，叫工人不要受共產黨的利用。然而工人竟不稍稍爲他動搖，於是工人很強硬的提出了四個條件：（一）軍隊和團隊先撤退然後復工；（二）復工後廿四小時內實行增加工資每天一升米錢；（三）原人復原工；（四）復工後不得開除或逮捕工人。這些條件資本家終於在羣衆勢力之下完全接受了，二十六軍團撤退，廿七日總工會下令復工，工人認爲這次鬥爭，步調還不整齊，雖然支持到十天之久，長土機車工人沒有一致行動。目前正開始糾察隊的組織，總工會將此次鬥爭的經過和沒有得到更多勝利的經驗教訓，普遍的在工會支部內討論，準備下次更有力的反抗。

自井罷工的影響，又爆發了郭井關一萬餘抬鹽工人（提裝工人）反提裝行的自發罷工，這一罷工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二、重慶鐵木機械工人的失業鬥爭

在手工業逐漸破業之下，工廠主只有更殘酷的剝削工人，特別是利用大批失業工人的弱點，控制在業工人，使在業工人在勿論何種苛虐的條件之下也不敢起來反抗。

重慶鐵木機械布工人，原來有三千左右，現在減少到一千二百上下，失業者佔一倍以上，主幫即乘此向工人進攻。第一改計時爲計件，每天限定工口，工口不夠，則扣到工資。因此，工人每天至少須做十四小時工作，萬一某件布重量不足，老板即強迫

以市價賣給工人，以爲懲罰。第二是低合銀價，從前每元換七千幾，現在換十三四千，但是現在老板給七千幾百文，便與工人合成一元。第三是不準工人出街，從早晨六點鐘到晚間八點鐘，工人須在潮濕黑暗的機房不斷的工作。第四盡量的招收學徒，利用學徒與成年工人鬥爭，利用學徒代替成年工也工作，使他們更快的失業。第五是強迫工人加入「老板工會」，一面免得工人出外開會，一面大抽會費每月半元。此外有種苛例，如不准與女工談話，違則罰錢或開除，伙食不加改良，每月沒有休息日……等等。至於工資每月至多不過四元。

工人在這樣剝削之下，去年在黃色工會領導之下，作了一次鬥爭，由社會局仲裁會議調解，勞資雙方簽定從今年起增加工資十分之三。去年放工時，老板亦叫工人早去上工。

但是，今天工友到廠時，老板一致拒絕工人說：「我們折了本，不能開工了」，實際是老板不僱不願加薪十分之三，反要工人「矮工低價」，一部份工人沒有飯吃，他只好忍痛的去上了工。這很明顯的，主幫由欺騙的方式，變而爲公開進攻的形勢了。

最後剩下百餘工友，流落在外，到了乞丐境地，無可奈何。只好去找鐵機工會（黃色工會）工會說：「去找社會局好了，我們不管」。工友於是到社會局，要他們給工做，給飯吃。社會局說「總是你們太懶，老板不要你們有什麼辦法呢」？工人非

常氣憤，自己組織了一個失業團，一面在工人，士兵，警察中募捐，維持生活，一面宣言與主幫及黃色工會社會局作長期的奮鬥。

失業團領導着全體失業工人到社會局示威黃色工會社會局初則以話威嚇！「把你們通通捉去關起」！工人大呼：「我們橫豎沒有飯吃，好的，我們願意這樣」！於是社會局又用欺騙的話向工人說：「你們暫時各人回去，下月無論如何強迫主幫履行條約」。工人認識得非常清楚，知道這不過是緩和工人的情緒，想另一種方法來襲擊工人，國民黨社會局和黃色工會整個的假面具揭破無餘了。羣衆高呼：「打倒社會局」！「打倒黃色總工會」！到街上示威遊行一二小時。

第二天工人以自己羣衆及各赤色工會，兵聯，警聯代表的羣衆力量，一廠一廠的排進工廠，自動開工，老板在羣衆勢力之下完全屈服了。

三月十五日，全體織布工人，開了一度失業鬥爭勝利慶祝大會，通過了赤色工會鬥爭綱領，正式宣布舊的黃色鐵機工會的死亡，并通過了新的鐵機工人聯合會的組織案和增加工資總同盟罷工案。

三月二十日新的工會成立，國民黨公安局也不敢解散會場。可是主幫則異常恐慌，收買工賊，搗亂，造謠，結果，工人的團結仍是非常堅固，在大會中并高呼「擁護蘇聯」！「擁護中國共產黨」！

三月三十日又召集全體工友，討論罷工問題，主帶一面唆使工賊造謠，阻止羣衆開會，一面報告公安局逮捕工人，解散會場。雖然捕去工人三人，會場被解散，然而工人情緒更加熱烈，臨時改變開會地址，具體的討論總罷工的佈置和糾察隊的組織。

三月三十一號，又召集羣衆大會，一面紀念「三三一」慘案，一面決定罷工時間。此時，重慶黃色市總工會，向公安局告密，捕去工會執行委員長和羣衆領袖二人。羣衆更加憤激，決定以罷工來援救被捕工友，加緊反國民黨政府機關和法西斯化的黃色市總工會。

這一鬥爭，雖然還沒有結束，但工人一步一步都是採取進攻的策略，他們衝破了國民黨的法律範圍，從鬥爭中爭得了赤色會工之公開的存在，從鬥爭中恢復了工作，推倒了黃色工會。

三、重慶兵工廠白藥工人的罷工和全廠工人的失業鬥爭

重慶兵工廠三千餘產業工人在劉湘趕造殺人武器加緊工作之下，年關不放假休息，白藥工人四百餘人，自動的宣布罷工，其餘造機工人子彈工人，造幣工人也同時息工。廠方恐怕這一風潮擴大對白藥工人提出的條件：休息五天，預支薪餉一月完全接受。五天休息已滿，工人又強迫多休息一天，廠方也真可如何。復工前，工人大開慶祝會。

這一罷工，影響到全廠工人，都要起來與廠方鬥爭。當時工人提出三條要求：一，年關休假；二，年關給獎；三，年關雙薪，工人準備大年（正月十五）一致罷工。但廠方得此消息，以先發制人的手段，將白藥廠門封閉，放出謠言，說是要全體開除白藥工人使白藥工人與其他下江工人（子彈，造機均是下江工人）分化，但廠方後來看見下江工人採取一致的行動又散布流言，說要將全體下江工人開除，使川江工人脫離下江工人的影響。但是工人雖然有許多地域觀念的弱點，廠方對他們一步緊逼一步的進攻，還是認識很清楚。工人方面積極組織全廠的同盟罷工，抗議軍閥資本家的進攻，并提出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

廠方的陰謀，以為首先關閉一部份廠門，借此威駭全體工人。如果工人表示軟弱，廠方即一面淘汰活動份子，一面改行包工制，工人知道這個消息，羣情憤慨，將包工頭高某（工程師）毆打一頓，廠方於是增加護廠兵，宣布戒嚴，準備以武裝鎮壓工人。十二日軍閥資本家關閉全廠威駭工人，三千餘失業工人，非常恐慌向廠方提出要工做，要飯吃，停工期間照發工資，廠方已發每人一月薪資，但工人仍繼續要求開廠。

在這鬥爭尖銳化的時候，資本家寧肯把工廠關閉起來，使工人失業，使工人無可如何完全被屈服在他們苛虐的條件之下，重慶兵工廠的關閉，就是非要工人承認包工制不開廠，資本家的面孔真像鐵一般的冷酷呵！

四、重慶油漆工人包圍法院的鬥爭。

油漆工人領袖蕭樹云被主幫勾結清共大同盟密告於公安局，說他是共產黨被捕入獄，全體工友，認為蕭樹云完全是為工人謀利益，無故被捕，集合到公安局要求釋放，公安局即秘密將蕭解到法院，工人第二天會同各赤色工會，兵聯，警聯代表二百餘人前去包圍法院示威，要求無條件的釋放他們的領袖，工人衝破了衛兵的阻止，到法院內高呼口號，并開羣衆大會，各團體代表都有熱烈的講演，兵士聯合會代表更鮮明的向工友們演說「你們鬥爭時，我們幫助你，我們暴動時，要你們來領導」法官初則威嚇鎮壓，而羣衆仍咆哮呼喊，法官只好承認羣衆立即傳密告人對審，密告人（清共大同盟常務委員）聽說工人聲勢很大馬上逃避起來，羣衆認為不能馬上得到結果，後到街上遊行示威高呼「打倒法院」，「打倒清共大同盟」……等口號。

第二次審訊時，工友們又全體到法院，要求馬上釋放蕭樹云，法院要工人具保狀，工人說「既沒有人對審，又沒有任何證據，當然無條件的釋放。」堅不具保，法官只好推委要得軍部的命令才放人。

工友雖然沒有得到好的結果，他們充分的認清了國民黨的法律是什麼東西，更了解了「司法獨立」又是什麼一回事！

五、成都黃包車夫的總罷工：

三月份成都三萬餘黃包車夫，宣布了總同盟罷工，這一罷工的浪潮，揭破了改組派之無恥和第三黨的欺騙。

照當地車夫工人的生活來說，可說在市政工人中最痛苦的了，每班車租由三千五到四千文，（即每天由七千到八千文）但車夫每天至多不能拖到十二千文（銀元每塊十五千）在此物價騰貴，食米飛漲之時，車夫維持個人最低限度之生活也沒有，但是，車行反在此時一致的估加車租每班爲五千文。工人於是自動的全體罷工了。

最無恥的改組派，提出「少加車租」的口號在工人中宣傳，主張「車夫與車行互相讓步」除了最少一部份落後的工人受他影響而外，大部份工人非常唾棄他的。其次是第三黨借政治的力勢，來欺騙羣衆，他主張「不加車資」，事實上在當時羣衆最近切的要求是「減少車租」應該領導羣衆這一更迫切的要求，「不加車租」客觀上還是替資本家消滅鬥爭，出賣工人利益的。共產黨不僅主張不加車租，更積極的提出「減少車租」「每月歡迎兩天」（不給車租的意思）最後，因罷工過久，羣衆的生活無法維持，第三黨借市政府（第三黨在成都的背景）的力量，完成了他「不加車租」的無斷的欺騙。

這次罷工，實際上是失敗了，工人也得進一步的來認識了國民黨系統下的改組派，第三黨都是一樣的無恥與欺騙。現正準備着在共產黨獨立領導下的第二次罷工。

六，川西獨輪車工人的武裝鬥爭：

川西獨輪車工人，在一萬以上，自從去年卸件改用駱馬運輸以後，生活即感覺非常痛苦，隨後，汽車公司又用汽車裝運貨物，獨輪車工人更是痛苦非常。他們曾經作消極的反抗，約集數十人橫臥馬路上讓汽車開來把他們輾死，但公司方面仍不讓貨物給他們運輸，工人只好盡量加重運輸，減少運費與公司爭生意，大家都改用鐵輪（鐵輪每次可運六七百斤，且少費力）公司認為這容易把馬壓壞，不准工人走中間，只准梭邊邊，不聽從的，即由公司所招的護路隊，將車子坎濫，提去鐵輪，兩三月來南門外被壞之車竟達五六十架，工人憤極忍無可忍，約集受害之車夫，將馬路上橋梁完全撤去，並將壞車堆集路上汽車開到時，工人各持犁頭鋤頭，忽出而襲擊，護路隊即下車與工人對抗，但車夫人多勢大，護路隊不敢動作，開車轉去。工人馬上號召約七八百人，各持小旗到城廿內四軍部請願，要求賠償損失，軍部支唔不給工人答覆，工人於是到車站衝進鐵門，毆打公司內的管理人，護路隊多同情工人，不敢鎮壓，駐軍趕到，向天鳴槍，羣衆鎮靜非常，官長婉言勸慰，承認勒令公司賠償，工人始慢慢散去。

兩天以後，仍無動靜，此時工人在川西獨輪車總工會領導之下更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起來，西外，北外，東外各路均一齊動員，不得勝利不止，社會局出來調解工人不接受，要直接與公司交涉，曾經作了一次二千多人的示威游行，一般市民，特別是學生羣衆十分同情，現準備在五一作更大規模的示威，如果政府要以武力壓迫，他們擬作巷戰

的答覆。

此外這三四月來還有很多的大小鬥爭，在成都來說有：南外兵工廠二千餘人的索薪鬥爭，東外機械廠反對開除工人要求加薪包圍經理會計的鬥爭；春熙路六百餘店員工人反虐待的鬥爭，三倒拐鞋業工人的年關加薪鬥爭，銅業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建築工人反行會抽收會金的鬥爭……等等。在重慶有印刷工人的加薪包圍經理室的鬥爭。鞋業工人加薪的鬥爭，白毛工人加薪的鬥爭，提莊工人加薪并反黃色工會的鬥爭，渡船工人反苛捐的鬥爭，洋服工人反黃色工會的鬥爭。棉紗帶店員工人反虐待的鬥爭。南岸運輸工人反日帝國主義的鬥爭……其餘各地都有蓬勃不斷的工人鬥爭。這一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三一」慘案後所沒有的。自然在這一些工人鬥爭中，還帶着大部分的經濟主義的傾向。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革命復興的具體表現。不僅城市的工人起來了，而士兵和警察也同樣的爆發許多偉大的鬥爭，如重慶警士總共只六百餘名，在士兵聯合會領導之下的達到四百餘名，并發動了全體一致的援助韋植聲無故被捕及其他無故竟革職的羣衆鬥爭，兵士方面在砲兵營也發動過開草鞋的騷動在涪陵組織了郭汝棟的兵變，兵變後到花村中發動羣衆，建立了鄉村蘇維埃政權，江津的士兵會自動的號召了兩連人的兵變，將團長拘禁起來，準備處以死刑。其餘有羅澤洲某營全營的譁變。劉存厚王光宗旅全旅的兵變。兵變後有自動到萬源找紅軍的。在農民的鬥爭來說，

一般的超過了減租反捐稅的鬥爭。萬源游擊戰爭已經由鄉村發展到進攻城市，兩月前即將城口縣城攻下，宣佈了沒收土地，槍斃了縣長，解除了駐軍王耀清全團的軍械。現正集中紅軍力量向梁萬發展與培豐忠游擊戰爭或農民鬥爭匯合，在榮威一帶農協組織逐漸恢復，準備發動游擊戰爭，在宜賓南六縣的遊擊隊也同樣有壯大的可能，在梁山農民會徵發了地主的穀米四五百石，創辦了農民學校，組織了二千餘農民赤衛隊，達縣南嶽坪農民會有一千餘人的示威打團練局反紅燈捐的鬪爭，在綿竹有三四千人圍攻縣城的農民暴動……這一些事實，充分表明了，各種鬥爭已求得了自然的配合。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有成都支持二十多天的全體罷市反印花稅警察捐，潼川有十多天的罷市反田頌堯的公債，在重慶南岸有五渡十三碼頭的罷市反對席酌捐和全市大罷市的醞釀。成都有過二十餘次不斷的學潮……這又證明了，不僅工農兵運動有平衡的發展。而市民小資產階級也更加對統治階級不斷的打擊。

三 羣衆鬥爭發展的前途

四川一般羣衆的鬥爭，無疑的在全國革命浪潮之偉大的推動下，走上了鮮明的政治的直接革命形勢。工人階級的鬥爭，領導着農民的土地革命如飛似箭的向前猛烈的發展着，使得豪紳軍閥政府，在革命浪潮之前發抖。

共產黨在廣大羣衆中的政治影響的增大，更是促進新的高潮之主要的動力，重慶自

從一月五號，反軍閥戰爭示威的公開號召後，不僅發動了大小十五次的工人鬥爭，而且在每一次鬥爭中都表現了羣衆自己的力量和反國民黨軍閥政府的決心，成都在「二一六」慘案紀念會被國民政府摧殘逮捕後，公然在「三三一」慘案紀念在公開號召之下，徵調了二千餘羣衆的示威大會，這一示威，并衝破了敵人的白色恐怖，游行路線經過四五里路，到最後羣衆情緒更加高漲，將成都國民黨官僚職工會搗毀，政府雖然逮捕了大批的羣衆，但在羣衆要求釋放被捕同志的聲威之下也得全部的勝利，重慶的劉湘軍閥，雖然他這次用了極野蠻極殘酷的白色恐怖，逮捕了二百餘革命的工農兵士學生羣衆，屠殺了共產黨的重要工作同志，然而他能撲滅整個的革命浪潮嗎？重慶的工人更加興奮起來，鐵木機工人積極的準備同盟罷工，江北兵工廠工人也積極準備反工頭開火食的鬥爭，渡船工人和提裝工人決定五一的總罷工行動，涪陵的遊擊區域一天天更加開展，劉湘自己的部隊也較前更爲動搖。市民醞釀着的罷市反抗公債，如果劉湘沒有法子能夠消滅那一切政治經濟的危機，他不能戰勝各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所引起的一切矛盾。他必然在最近的將來在廣大的工農兵士羣衆前面受着最後的裁判！

或許有人以爲四川的經濟落後，羣衆的鬥爭也必然落後。這完全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取消派心理。自然，四川的經濟比較落後，但這只能說明鬥爭的方式落後，羣衆的組織落後，鬥爭一樣的在轉變他的新形勢。黨只要能夠艱苦的去戰勝目前一些實

際的困難，在正確的黨的策略之下去發動羣衆堅決的去組織幾個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罷工，擴大萬源，城口，涪陵等縣的赤色區域和榮威一帶的游擊戰爭的領導，組織幾個中心部隊的士兵暴動，使這些鬥爭能夠有計劃的求得配合，雖不能說在全國範圍內有四川一省單獨的首先勝利，至少在全國某幾省特別是武漢鄰近幾省勝利中，四川一樣的可以趕上客觀的蘇維埃政權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的要求。第一四川共產黨和羣衆吸收了湘、鄂、贛，粵許多農民鬥爭，尤其是上海工人鬥爭的經驗教訓，這些血的珍貴的寶物，只要能活潑的運用到四川，教育黨，教育羣衆，必然要少受着很多嚴重的失敗，迅速的達到任務的實現，第二四川軍閥的戰爭，雖然仍帶着過去一貫的形式，——同樣的反革命戰爭，但牠有牠這次爆發的意義，前年的下東戰爭，去年的東道戰爭，一般人民對他的態度，只存着希望和平，幻想軍閥的覺悟，甚至黨在那時陷於非常之機會主義的路線，沒有堅決的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現在呢？，不僅黨能夠在軍閥戰爭中號召廣大的兵變和羣衆的武裝鬥爭起來變軍閥戰爭爲革命戰爭，爲革命的蘇維埃的戰爭，一般羣衆也將脫離那種「希望」「幻想」的夢鄉而走上動的鬥爭道路。第三全國革命浪潮，直接幫助了四川鬥爭的發展，譬如重慶反軍閥戰爭的示威，成都「二一六」「三三一」兩次的示威，各種工農兵士鬥爭之很快的走上政治鬥爭的前途，決不能說毫無全國的影響。特別是全國紅軍的壯大，蘇維埃區域的擴張，這是給四川沉靜的民衆一個很大的震動。

第四，這最根本的一個條件，是一切危機的到來（如前面所說）工，農，兵士城市貧民生活之極端惡化，農民無限的破產而流為原始行動（如涪陵一縣有三四萬土匪，沒有一個農民不是土匪，各縣都有神兵的組織）工人普遍的失業形成社會的騷亂（如重慶今年失業的工人在三萬左右，成都也經常有兩三萬人的失業，自井失業成了全區工人的恐慌）士兵的欠餉一般在六月左右，兵變成了普遍的現象。再加上許多地方的天災水患，飢民普地皆是，（川北許多縣份）過去雖然說四川怎樣的怎樣的危機到來，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厲害。

我們估計四川羣衆鬥爭的形勢和其發展的進途，決不要機械的去從牠本身的組織和目前鬥爭方式上去罷，一定要把上面所述那四個條件合併起來去估計，否則，定然會以「羣衆組織薄弱」「階級意識模糊」「經濟主義濃厚」……等一類的觀念無意中在原則上取消了政治罷工，游擊戰爭，士兵暴動的領導，這是客觀上幫助了國民黨政權的延長！

因此，我們要堅決的領導羣衆走上四川全省或全省範圍內某幾個區域內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最後我舉幾件實際的例子，來作為我這篇文章的結論：

第一、榮威的農民鬥爭，去年六七月內已走上了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的前途。他

們自動的集中武裝，解除地主階級的武裝，更進一步準備向駐軍攻擊，但是，黨和農民協會下令停止了農民的這種直接行動，主張「分散武裝」，「整頓後再幹」。結果，駐軍下鄉包圍，按戶搜索，將農民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得的武裝一支一支提去，農民領袖也一個一個捕去槍殺，於是農民說：「早知這樣，該不聽農民協會的話」。

第二，宜賓去年的減租鬥爭，在行動上，農民已踏進「抗租」的範圍，他們認識得很清楚「只有拿槍去打地主，才能得到勝利」，農民圍瓦屋，圍大塔都首先舉起槍來要向地主開槍，黨和農民協會却命令羣衆「請候交涉解決」，農民有氣得暴跳的，甚至有武裝農民竟因此脫離農協拖到山上去了，後來地主階級一面在交涉上允許農民減租，一面暗暗派兵襲擊農民，結果，農民失敗，捕去農民領袖三十六人鎗斃。黨在這次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的決議案上還說，游擊戰爭槍斃地主不過是威嚇他使他屈服，然後從「交涉」中實現我們的要求，「這次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由於農民不聽命令自由焚燒房屋的盲動」，「搶地主的谷子是野蠻行動」！現在農民都有這種心理：「倒是大幹起來，恐怕不會拿與軍隊殺頭吧」！

第三，江津的兵變，羣衆自動的將團長拘禁起來，要槍斃他，說他反革命。私辦兵士，黑暗專制，軍支認爲「兵變條件沒有成熟」命令他們將隊伍拖了回來，於是上級長身一面用改良主義欺騙羣衆，一面用白色恐怖鎮壓，以致許多活動的士兵不能立脚，通

逼被趕了出去，羣衆也覺得有些灰心，找不着出路似的。

從上面的三件事實中，我們如何可以看出羣衆的鬥爭的形勢，牠教訓我們革命的黨，也指示了一般鬥爭的出路，只有進攻才能衝破白色恐怖，只有進攻才有徵調更廣大的羣衆，只有進攻才能爭取更多的勝利，只有進攻才能建立工農兵士蘇維埃政權！

一九三〇，五，一五日於上海